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284期

华忆图书专辑（5）

【华忆简介】

为华人服务，出华语好书

【答客问】

有劳君子遥相问，道是有号又有书

【历史文集】

王本中 启之编 北京盛夏一日（1-3卷）

——1966年“八一五”事件：回忆、反思与争论

编者前言/启之 代跋/王本中

推荐语：牛大勇 刘北成 金光耀 傅 蕾 迟 淼

单少杰 乔晞华 丛立新 崔金珂

【学术文集】

毛崇杰 启蒙 美学 文化——论集

作者简介

内容简介

后记/目录

【史料汇编】

胡宗式 章铎 编 北京大学文革史料选编（1-3卷）

编者前言

内容简介/目录

【历史研究】

周孜仁 云南文革史（下卷）

内容简介：第四卷 周兴时代 第五卷 贾启允时代 第六卷 后文革时代

跋：亲历者的使命

【本刊声明】

【华忆简介】

为华人服务，出华语好书

美国华文记忆出版有限公司在得克萨斯州 (State of Texas)，简称“华忆”。出版中英文学术著作、文学作品、回忆文集、文史散文、随笔札记、人物传记等。华忆的宗旨是，出华语好书，为华人服务。

作为一家海外华文出版社，华忆有如下特点。

第一，收费低廉。每本（480页以下）的书仅收980美元，也就是说，编/作者只需用6860元左右的人民币，即可在华忆出书。所出之书有实体和电子两种版本，这两种版本均有国际书号（ISBN）。华忆还会为每本书向美国国会图书馆申领国图编目号（LCCN），并按国会图书馆的规定，呈交一本样书，以为备案之用。同时，大陆的编/作者获赠10本样书，欧美的编/作者获赠1本样书。

第二，讲究效率。通常情况下，一部编校完毕的“齐清定”的书稿，一周之内即可完成排版和书封设计，两周之内即可付梓问世，第三周编/作者即可在卢鲁网（Lulu）、巴拉芭网（Blurb）和谷歌网（Google play）上看到新书。在新书问世后的第一时间，华忆即会给编/作者向国内寄出样书，在没有突发的不可抗力的情况下，编/作者将在一个月内收到样书。

第三，重视服务。在接到客户信函的一个工作日内，公司主管即会答复。如来稿需要编辑和校对，华忆将为编/作者推荐资深的编校人员。编校、排版后的书稿和书封会交给编/作者征求意见。所赠样书，免费寄到编/作者指定的中国大陆的地址。编/作者如需要更多的实体书，华忆将提供包印包邮的服务。

第四，分成合理，账目透明。华忆售书所得，除纳税之外，余者与编/作者五五分成。每年2月结账一次。用户可随时查阅各网站的销售情况。

得克萨斯一词来自印第安语，意为“朋友”。华忆虽远在大洋彼岸，但与国内作者休戚与共。它愿在大道沉沦，风雨如晦之际，为自由言说略尽绵薄。📖

华忆的信箱 (Email) : RememPub@gmail.com

华忆的网站: jiyi2008.com 电话 (Tel) : 512-699-2700

华忆的地址: Remembering Publishing, LLC,
9600 S IH-35, C600, Austin,
TX 78748, USA

【答客问】

有劳君子遥相问，道是有号又有书

问：在美国十大华文出版社之中，华忆有什么优胜处？

答：华忆除了提供国际通用书号（ISBN）之外，还为每本书向美国国会图书馆申领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英文全称：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 Number，缩写：LCCN）。绝大多数美国华文出版社要么没这个资质，要么没这个知识和能力。

问：这个编目号码有什么用？

答：凡是进入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的中文图书，都会成为美国其他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采购中文书的参考。在前十名美国华文出版社中，只有美国南方出版社偶尔能申领到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编目号，但是这家出版社面向的是国外华人，所以它的收费很高（380页以内的书起价1500美元），而且它只出文艺书籍（小说、诗文）。更重要的是，它无法满足作者对纸质书的需求。也就是说，你如果想多买几本自己的书，它办不到。

问：这么说，你们华忆能满足客户对纸质书的需求？

答：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华忆胜出所有海外华文出版机构的地方。因为华忆具有申领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的资质，同时又是双语（中英文）出版社，所以国内出版机构多愿与之合作。合作者或希望通过华忆将其出版的图书进入美国国会图书馆系统，以便在国际舞台上弘扬中华文化；或希望将其出版的中文书的英译版交给华忆在海外出版，以便让他们出的书赢得更多的西方读者。这些合作伙伴足以担负华忆客户的购书需求。

得克萨斯一词来自印第安语，意为“朋友”。华忆虽远在大洋彼岸，但与国内出版界风险共担，与国内外的华文作者休戚与共。它愿为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兴盛略尽绵薄。📖

华忆的信箱 (Email): RememPub@gmail.com

华忆的网站: jiyi2008.com 电话 (Tel): 512-699-2700

华忆的地址: Remembering Publishing, LLC,
9600 S IH-35, C600, Austin,
TX 78748, USA

【历史文集】



北京盛夏一日

1966年“八一五”事件：回忆、反思与争论（1-3卷）

In the Heat of a Summer Day in Beijing:

Remembrance, Reflection and Debates on August 5, 1966 Incident (1-3)

王本中 启之 编

编者前言

缘起

这本书的编辑出版，与“女附中丛书”有关。为了纪念卞仲耘校长，总结文革教训，从2014年起，原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名为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一群七旬上下的老女生，走访师生，钻研史料，爬罗剔抉，编排撰著，历时三年。拿出了六大本400万字的“女附中丛书”。这期间，两人逝世，多人伤病。

经过了三审五检，七减八删，丛书的第一本《远去的女附中》终获通过，而就在出版社开印之际，上边来了电话：今年是重要节点，关于文革的书一律叫停下架。

这些老女生不得不上梁山，下江湖，走上自印之路。后毛时代，书报审查日严，出版社书号日减，图书问世日艰，自印书成了一道隐蔽的风景区。2017年8月25日是个大喜的日

子——成千包自印书运到了学校，数年的辛苦坎坷，终于结出了果实。老女生们了却一件人生大事。

然而，喜中有忧——这种自产自销的书，如果仅在小圈子里传播，只在几个图书馆里睡觉，意义何在？既然朱镕基、邓立群的书可以在香港问世，我们的书为什么不能乘桴浮于海？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既然在海外出版，为什么还要使用被审查修改过后的版本？

眼前的这套书，就是另起炉灶的结果。

内容与主旨

这套书的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这所中学文革前的教育，二是“八五”事件现场的回忆；三是对事件的分析；四是纪念卞校长的活动；五是关于“八五”事件的争论与社会反响。

编这套书的主旨，往大了说，是为了查找“八五”事件真相，反思暴力根源。通过关于事件的争论，反映近年中国的社会心态。往小了说，是告诉人们，这些老女生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为什么这样做。

六年前，一位作家在其博客中，回答了这些什么和为什么——

有这样一群老女生，不合时宜、不随大流、不看天色，旷日持久地干着一件事，就是要弄清楚文革初期她们的母校发生了哪些事？校长是怎样被学生殴打折磨致死的？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惨剧？她们寻找当事人、亲历者，以谦卑的态度以心交心，召集各种座谈会，邀请本校老师、校友和外校同龄人，共同回忆、探讨文革历史。不仅如此，她们还在校友中发动捐款为死难校长塑像，举行隆重肃穆的纪念仪式，自己编脚本、自费出纪念光盘。她们与专事文革研究的电子杂志《记忆》共同编辑本校文革专辑共6辑数十万字，为文革研究者提供了一所中学的文革（初期）历史样本。她们不惧怕谣言、不在乎谩骂，把事儿越做越细致越做越深入，不仅吸引了国内媒体的年轻一代记者，也有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主流媒体，纷纷前来对她们进行采访报道。《南方周末》则派出优秀记者独立进行采访，历时两个多月，以四大版面深度报道。这些和文革过不去的老女生，是原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实验中学）的老三届学生，都已年过花甲，“家庭出身”各有不同，文革中分属不同派别。直面历史，拒绝遗忘，用拱卒精神推动文革反思，促进社会和解，对她们来说，既是动力，也是目的。

这是《我的文革纪事》后记中的一段话。作者是冯敬兰。她是老女生团队的先锋、重镇和笔杆子，是第一个公开替宋彬彬说话的人。

编辑方针

如果说，“女附中丛书”是戴着枷锁的跋涉，那么，这套书则是赤膊的短跑。它脱去了政治的束缚衣，扔掉了丛书的装饰物，告别了一级又一级的审查官，挺起胸膛，大声宣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思想冲破牢笼！要为真理而斗争！

一旦手脚失去了枷锁，思想就不免放飞。在编书的过程中，上述内容不断被丰富。编者的认识也不断被刷新，我们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这不是论文集，你不能要求每篇文章都思想独立，观点新颖。恰恰相反，你得忍受荒诞的逻辑，假想的推论和不断重复的观点和文字。也就是说，如果某些作者在新证据面前，仍然坚持他多年前的观点，那你也不能把他排除在外。你非但要收入这类陈词滥调，还要保持它们的原貌——除了纠正那些影响理解的错字误植，格式、体例、病句、误标统统保留。免得说你篡改了作者的原意。

面对数百万字的资料，必须有所取舍。我们的标准是，为突出重点，凡代表性的言论，只要叙述完整，不管观点各异都尽量收入。为研究方便，我们会注明文章的来源和发表时间。

进入新世纪以来，因“八五”事件引发的争论有四次，第一次是2004年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上映；第二次是2007年实验中学评选“荣誉校友”（最初提法为“知名校友”——编者）；第三次是2010年宋彬彬发表《四十多年我要说的话》；第四次是2013/2014年陈小鲁、宋彬彬道歉。这四次争论，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一次比一次人数多，一次比一次议题广。在媒体的推动下，它们形成了舆论热潮。

此书将这些争论汇编一处，希望它能作为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代中国的社会心态——从那些不断重复的陈述、声讨、斥责和咒骂声中，庶几可以体会到民间那沉郁多年的怨恨和戾气。“事无两样人心别”；明眼人都知道，这怨恨和戾气从何而来。

上述想法，决定了这套书的结构：“八五”事件成了持久的社会焦点，宋彬彬与红色暴力仿佛生死搭档。不论中外，不管什么人，只要说一句与民间主流观点不同的话，批判者就会蜂拥而来。根据这一雷打不动的现象，这套一百多万字的书被编成了环环相扣的七辑。

第一辑 背景与前奏

背景指的是“八五”事件发生的历史环境，前奏指的是文革的酝酿和先声。此辑的前5篇出自五位校级领导之手。她们的个人回忆或工作总结，集中体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学的教育方针。此后的两篇，是朱学西的口述和冯淑良之女对母亲的回忆。这两位右派教师

的经历，掀开了时代政治的阴暗一角。这一辑的主体是文革老三届对母校的回忆。她们的经历和感受，是观察红色文化的窗口，也为我们揭示了政治思想教育与文革暴力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辑中，值得关注的是朱学西和有关冯淑良的文章，他们都是优秀教师，都被打成了右派，都有着悲惨的遭遇。文革中，作为“摘帽右派”的朱学西被女附中的学生揪斗殴打，与胡志涛等校领导关在一起。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工军宣队对教师的迫害——不断制造的冤假错案，不断增加的自杀人数，家庭破碎，儿女遭殃……女附中的另一幕血泪史，在他的笔下汨汨而出。

周馨的《献给母亲的手记——冯淑良的右派人生》，让我们再一次感到了历史的复杂和人物多面——卞仲耘既有教育工作者的精进与仁慈，也有党务工作者的无奈与无情。她生前蒙受了从政治到作风的一连串冤屈，同时，她也不能不担当起制造本校右派冤案的相关责任。冯淑良夫妇与卞仲耘、王晶珪夫妇是“经常在一起玩”的好友。且冯的丈夫在延安时，就与胡志涛的丈夫丁丁相熟相知。周馨不能理解，为什么“卞仲耘和胡志涛会对我妈落井下石”？当她向父亲提出这个问题时，其父低头不语。而当冯淑良听说卞仲耘被打死，胡志涛被打残时，则平静地对女儿说：“她们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最终会弄到自己的头上，那一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¹。”

女儿的疑问，父亲的无语，母亲的结论，在罗治的《浅谈师大女附中十七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一文中得到了全面的梳理，17年的政治与暴力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得到了清晰的展示。刘秀莹称赞以卞仲耘为首的解放区来的老干部“只用了17年，就把一所旧社会的女子中学办成了一流的社会主义新型女子中学”。卞仲耘之死逼迫我们去面对一连串大是大非的拷问：卞校长和她的同事们17年努力的功过？新中国的学校出了什么毛病？旧中国的学校有哪些优胜处？怎样评价毛时代的“破旧立新”？怎样评估五四激进思潮？革命的意义何在？为什么许多知识分子会投身延安？……

卞校长至死不知道她为什么而死。那些活下来的老领导们——彭文、苏灵扬、胡志涛、孙岩也未必清楚。倒是她们的学生们看得分明——上述几篇文章的作者，从不同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而陈小鲁在去世前四年就告诉女附中的老女生：应该认真研究17年的教育，看它“如何排斥宪法和法律教育，公民权利和义务”“实际上到今天为止，仍然忽视这一点。”（详见第五辑叶维丽纪念小鲁之文）小鲁点出了事情的实质。

¹ 据朱学西老师回忆，在女附中划右派的工作中，胡志涛起的作用比卞仲耘大。

第二辑 “八五”事件

1966年8月5日，卞校长死于学生之手。这一事件成为这所著名女校的奇耻。此辑的主要内容，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对暴力现场的回顾，所收文章最早写于1986年，最晚写于2011年。为了使读者对这一事件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我们将《“八五”事件综述》放在开头，将王友琴1986年发表的《女性的野蛮》作为序幕，将“八五”幸存者胡志涛副校长的回忆、伏生等亲历者对暴力现场的描述作为这一辑的主体，俾使读者从多角度了解当年的暴力现场。

这一辑的重点是叶维丽的系列文章。叶是女附中老初三的学生，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八五”事件发生时，她不在现场。但是卞校长被同学们活活殴打折磨致死一事，成为她的心灵上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卞校长的音容笑貌和血肉模糊的尸体，多次让她在梦中惊觉。在调研“八五”事件，揭示其性质，批判其恶行方面，叶维丽并不是先行者，但是，将“八五”事件纳入历史学研究，考察其发生的背景，去掉事件的神话化，以客观中性的专业眼光，从多层面去分析研判这一事件的，叶维丽是第一人。读者可以从叶的文章中，体会出学术研究与记录/谴责之间的区别。

冯敬兰等五人的《也谈卞仲耘之死》是女附中老三届回顾“八五”事件，反思校园暴力的一次集体发声。与叶的文章一样，这个“五人谈”也遭到了国内外舆论的指斥和责难。收录于此，既是给此辑做一小结，也是为研究留下一份文献。

这一辑有27个附录，前20个是1966年6月间工作组负责人在女附中的讲话汇编，后7个附录的主要内容集中在邓小平身上——邓小平对工作组的讲话，他给中央写的检讨，胡启立和邓的女儿对他的揭发。

第三辑 “荣誉校友”事件

这一辑文字不多，但内容丰富。

2007年9月，实验中学庆祝建校90周年，宋彬彬因是麻省理工学院地球化学专业第一个中国大陆女博士，成为90名“荣誉校友”中的一员。校方欲借此“历史契机，打造名校品牌”；宋彬彬欲借此庆典，澄清文革对她的污名。校庆大典上校方不仅把“八一八”宋彬彬给毛戴袖章的照片制成大幅展板，竖立在会场之中，还把此照片编入《90年图志》之内。校方的这一做法，“在海内外引起普遍谴责，网络和刊物上质疑之声遍布。”（王晶垚语）

最引人注目的，是王晶垚致校长袁爱俊的公开信。这位时年86岁的老人认为：“八五”事件时，宋彬彬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她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校方将宋

定为“荣誉校友”；并将毛接见宋的照片和受难者卞仲耘的照片一并刊登在《校史》和《图志》中的做法，“是对中国全体文革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再一次最严重的伤害，对历史的亵渎。”王晶垚要求校方，撤销宋彬彬“知名校友”的称号，“将处理结果通报海内外校友和在校师生员工……让青年学生认清文革曾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女附中高中学生陶洛诵在2004年出版的《生之舞》一书中，写到了宋彬彬在打人现场说过“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作为宋负有罪责的证词，此时也在网上疯传并被广泛征引。一位叫shiyigong的作者发现《图志》上的照片说明，隐瞒了时间和人物这两个关键词。认为这是袁爱俊校长为了掩盖宋彬彬杀人的真实面貌，导演的一幕丑剧。“祭园守园人”将林彪的女儿林晓霖和宋彬彬做比较，认为林晓霖代父谢罪，是“用真诚与执着敞开着自己温馨而博爱的灵魂”，而宋彬彬“一直以铁石般的冷漠面对那段浩劫国耻和校园血案”。另一位批判者严家伟在指斥宋彬彬“对当年的所作所为，没有半点歉疚”的同时，也对学校当局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这些正义满胸的作者遭到有力的反击。首先站出来的，是原十一中学教师方竹影。他告诉人们，他当年在文章中写的那位打死人的女生宋某，不是宋彬彬。是别人改成了宋彬彬在网上传播。一位女附中校友齐心认为陶洛诵的证词：“是无中生有的杜撰。当时我们几人一直与宋彬彬站在一起，没有人听见此话。”女附中初中生冯敬兰在博客中开辟专章，介绍了《图志》的那两幅照片及其说明，并质问：“这样做，怎么就被指斥为‘为文革翻案’？用了宋彬彬那张新闻照片，怎么就是宋彬彬在炫耀？这样的推理，是不是和文革中时常在一张画片里寻找‘反动标语’有些异曲同工？”

第四辑 《记忆》女附中专辑

这一辑的大部分内容来自《记忆》女附中专辑（第47和49期）。正是这两个专辑把名不见经传的《记忆》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记忆》也从此被视为宋彬彬团队的成员，受到来自海内外多方面的攻诘和诬陷。《记忆》也因此一发不可收拾：在推出四期女附中专辑之后，又将红色教育、北京师大二附中文革，以及高校文革研究设为专辑出版。

这一切，似乎都是从一篇文章开始的——在这两期刊发的数十篇文章中，最触动社会神经，最具有揭秘性质，因此也最有历史价值的，是宋彬彬的《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此文在把《记忆》推上风口浪尖的同时，也在海内外激起了轩然大波。这一波上“荣誉校友”事件导致的中外抗议，下启陈宋道歉引发的舆论大潮，在中外媒体上，演出了又一场大戏。

这场大戏使周学敏和闻佳的遭遇难免受到了不应有的冷落——1968年9月15日，以优异的“教学法”闻名全国的语文教师周学敏，因莫须有的历史问题，被迫吞药自杀。1970年2月21日，初三学生闻佳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判处有期徒刑20年。文革不同阶段的黑暗与凶残于此可见一斑。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辑既是对第一二辑内容的深化和扩展，也是对第三辑的舆情问责的回应。

这一辑的另一个内容是为卞校长塑像。这是2007年筹备90周年校庆时，由五位校友首倡，由执行小组运作的大工程。募捐并非想象中那样，人人赞成，个个踊跃。事实上，不解者有之，非议者有之，公开抵制者亦有之。这需要各届各年级的积极分子解释说明。换言之，捐款的过程，也是女附中老校友，重温历史，反思文革的过程。经过两年的努力，执行小组收到18个年级44个班504人（包括两位老师）的捐款。四年后的母亲节那天，这所中学举行了卞仲耘塑像揭幕仪式。

细心的读者，可以从塑像上的铭文和塑像的安放处，体悟到执行小组在“预防性管控”下的无奈——她们本想在塑像上留下的“八五”事件的铭文，然而，从上到下的封口令，使这一愿望落空。“黄昏血色，往事何堪回首 / 绿地晨曦，今朝勿忘反思”——将卞校长的塑像安放到校园的绿地上，让一届届学生了解那段血腥的历史，这是504位捐款人的心愿。但是，经过反复商量交涉，还是不得不按上边的意思，将塑像放在学校的会议室。这就是国情。

第五辑 问责与追凶

这一辑是上面所说的那出大戏的正式演出。2010年《记忆》刊发了宋彬彬之文。舆论洪流由此涌向这一民间平台，揭露、谴责、斥骂，作者观点对撞，读者函稿交驰。对宋彬彬的声讨之文接踵而出，海外以敏一鸿、王容芬为主力，国内有朗钧、雷一宁为前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否定派阵营。

在这些人的文章中，朗钧的《伫视王晶珪：宋彬彬对簿历史的公堂——〈宋彬彬谈话纪要〉的解读及其他》一文，对宋彬彬的批驳最富激情，最深入人心，因此也最有代表性。作者以高度的正义感，为文革受难者发声。以满满的仇恨心，向宋彬彬及其同伙追责。作者认为，《记忆》为红卫兵和红外围张目，它编发的女附中专辑在“改写历史”。宋彬彬的《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是“欲盖弥彰”，是向王晶珪寻衅。叶维丽、于羚、卡玛是宋彬彬的同伙，在为“红八月”辩护。范世涛（朗文误为范世龙/范式龙）的文章“是一篇诋毁文，更是一篇献媚文”“该文章在厚颜吹捧宋彬彬和刘进的同时，将污水泼向卞仲耘校长”。叶维

丽等人主张的探讨真相，追究细节是掩盖罪行。女附中为卞校长塑像，“是在用建一座雕像推卸掉了揭露一场血案真相的历史责任”。卞仲耘的雕像上没有注明卞的死因，是因为“红卫兵不允许”。

作者引证了大量资料，对几个重大史实进行了力所能及的个性化解读。他认为：“八五”时，女附中没有失控无序，不存在一个权力真空，当时不但有“文革筹备小组”，还有红卫兵组织，作为筹委会和红卫兵组织的成员，刘宋有职有权，是她们确定了批斗校领导的名单，是她们组织了对校领导的批斗。宋彬彬没有劝阻殴打校领导的同学，没有抢救卞仲耘。抢救卞仲耘是叶维丽等人在《记忆》上编造的“神话”。宋彬彬是红卫兵的代表，他们对文革死难者家属抱有“真真切切的仇恨”。为了掩盖罪行，她们从2002年开始，就有组织、有计划地打入王晶垚的家，遂“有了十年持之以恒的鬼祟和欺诈”。

此文对“八五”事件的背景因果和女附中校友探讨历史真相、反思红色暴力、检讨事件责任、为卞校长塑像等活动，都做了极富特色的解读，为第三波社会反响中的否定派奠定了思想基础。成为“翻案说”“团队说”“阴谋说”“掩盖说”“包庇说”的始作俑者。

与朗钧、王容芬等人观点相对的，是启之、胡泊等人。他们用散文的形式，杂文的笔法，试图从符号学、传播学、泛政治化，和历史的神话化等方面，对这一波社会反响做出解释。

第六辑 座谈会 · 见面会 · 沟通会

此辑是四个会议的实录。2014年1月4日，师大女附中、北京八中、北京四中、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老三届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召开了“老三届同代人座谈会”。人大党史教师及《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财经》杂志和《记忆》网刊的记者等二十多人与会。除了陈小鲁、宋彬彬、刘进三位之外，女附中的郝新平、叶维丽、罗治、顾媛，四中的印红标、吴迪，北师大一附中的丁东，清华附中的卜伟华，太原五中的邢小群及北京景山学校的郭小林等人在会上发言。寻找真相成为发言者的共同心声。

2014年1至2月，女附中召开了三个会，前两次是师生见面会，会上师生回顾既往，反思文革，凝聚共识：一、为卞校长塑像是正义之举，女附中老三届做了一件好事。二、当局对文革的屏蔽，对反思的打压是劣政恶法，误国误民。三、文革的根本责任在中共领导层，首先道歉的应该是他们。四、宋彬彬、刘进等人的道歉是真诚的，是对历史的担当。后一次是师生沟通会。会议提出了建立文革道歉平台、设立“校耻日”、出版图书以抢救记忆等后续工作。在这个会上，刘进有了一个发言——《做文革调查的一些情况和体会》。在这个发

言中，她谈到了做“八五”事件调查的原因和动力，谈到了她为什么没有披露打人者的名字——“如果我这样做，才真正是为洗刷自己而捡起本已抛弃的垃圾，是重蹈覆辙，而不是一个公民的依法而为。我理解很多人这样问这样说这样写的合理性，我也要说出我的合理性。”

这一辑有八个附录，重点在前五个。附录一是罗治解释为什么王晶焄先生没有参加师生见面会。附录二至四是王友琴与刘进、朱晓茵的观点交锋。附录五是女附中初二校友黄晓莉的道歉信。

上述四会八文，除个别外，都不曾上网见报。将其汇编一处，既为存史，亦可鉴今。

第七辑 陈小鲁、宋彬彬道歉

2013年，陈小鲁道歉之后，文革暴力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宋彬彬随后的道歉，引发了更大的社会反响。当局对文革言说的封杀，对毛泽东的袒护，对负有血债的老红卫兵的放纵，加上现实中塌方式贪腐，某些红二代、官二代的升官发财……历史与现实，政治与民生，携手并肩，冲进互联网。互联网上再一次开了锅——舆论沸腾，诘疑腾于众口；斥责踵出，风议遍及海外。

与前两波相比，否定派的声音更强，海外华人王友琴、王容芬、亦虹、敏一鸿、徐贵、裕雄、陈永苗等，或诉诸媒体，或发声撰文。不约而同，指斥宋的道歉是假，掩饰红卫兵暴行，洗白自己是真。

国内的否定派，以刘自立、罗四翎、朱学勤、钟声为代表。朱学勤认为，宋彬彬从“2007年之后整整六年，她始终沉默”，这个时候道歉，是“择机行事”“欠缺诚意”。有人要求国家道歉，“宋彬彬团队立刻抓住这一正当呼声，来为她们自己的责任开脱”。来自“乌有之乡”的钟声等人则从肯定文革的角度，指责陈宋红卫兵打人抄家破坏了毛主席伟大的战略部署。

在众多的声讨之中，杜钧福的《陈小鲁的道歉不能洗清“西纠”的罪恶》一文看到了事情的复杂性，在对“西纠”的成立时间、组织活动做了大量的调研之后，作者指出，陈小鲁向母校老师道歉应该肯定，但是作为“西纠”的负责人，陈对“西纠”后期的暴力应该负领导之责。作者没有停留在大而空的道德批判上，而是从细节入手，给陈小鲁提出了十五个问题。这种思路和方法，将“西纠”研究引向了纵深。

对宋彬彬道歉的肯定派，以萧瀚、印红标、丁东、启之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宋的道歉有益于探索真相，有助于社会进步。肯定派有一个共识：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当时的背景和语境。只有把当事人放到具体的环境中加以考察，才能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综合肯定派的思

路，他们的认识似可概括为这样几个问题——

一、指出王友琴书中的不实之处，或对她的某些提法存疑，是不是就是否定她的贡献？就是替老兵翻案，就是掩盖真相，就是袒护宋彬彬？

二、王晶珪的记忆是否准确，他提供的证据是否不容置疑？他和其他的受害者，如陈洪涛（林莽）在对待历史事件时，是否会有个人情感和主观认知？指出他们的记忆/证据之误，是否就是替老兵翻案，就是掩盖真相？

三、宋彬彬是否有辩解的权利？考察其辩解的正误真伪，是以事实为依据，还是以政治为依据？承认她有辩解之权，听取其辩解，是不是就是替老兵翻案，就是掩盖真相，就是维护中共/毛和一党专政？

四、在当下之中国，国内的文革研究者和文革道歉人能否自由言说？如果道歉人没有公开批判首恶和体制，其道歉是否就是虚伪/造假，就是投机/作秀，就是包庇/掩盖？就是开脱/逃避？

五、为达到一高尚目的（探索历史真相，伸张社会正义，彻底否定文革等），是否可以不择手段？

这些问题分别针对的是王友琴、王晶珪、宋彬彬这三个人和他们的言论。否定与肯定以此为界碑，学术研究与揭批以此为分野，肯定派人少声稀，不成气候。

在否定与肯定之间，有一个宽阔的地带。个中详情，可见启之的长文《道歉·追责·真相·和解——文革政治文化遗产刍议》。

结语

2011年母亲节那天，在卞仲耘塑像揭幕仪式上，北京八中老三届钟里满发表感言：“不少学校都打死了校领导和老师，有的甚至更为残暴，但都选择了集体沉默，唯独女附中校友开始了对文革的集体反思。”（校友网留言）。不用说北京，就是在全国，又有哪所学校的老三届，像女附中这样，几十年如一日，携手并肩，“拱卒”不止？

问题是，即便如此，也丝毫不妨碍舆论界把她们当成文革余孽，几十年如一日地指责、训斥、咒骂不止。这其中固然有个人因素，但是主要动力仍然来自现实政治——只要文革不被清算，否定派就永远有理由，宋彬彬就永远是政治符号，而即使文革被清算，神话与故事也仍然比历史与真相更招人喜欢。

2013年1月，针对否定派的诬蔑与攻诘（拒发王友琴的稿子，为老红卫兵说话，为文革

翻案等等),《记忆》主编发表了《告读者》,重申这家民办刊物的宗旨:《记忆》是一个独立言说的平台,只要是讲理的文章,都应予发表。《记忆》反对一言堂,反对不让别人说话(第92期)。这套书的编辑,秉承的仍然是这个宗旨。

“记忆民刊,志在启蒙。仁人君子,鼎力玉成。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是《记忆》与友人共勉的四言诗。这里所说启蒙,不是革命、急进、激情和全盘否定,而是“多元、宽容、理性、法制”。是波普尔(Karl Popper)所说的“你也许对,我也许错,让我们共同努力以接近真理”的批判理性。¹

这套书是以中学老三届为主编写的第一部关于一所中学的文革事件史,它既是历史教科书,也是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缩影。它与华忆已经出版的《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船山书屋即将推出的《南大附中教改资料汇编》交相辉映,为文革研究添砖加瓦。遗憾的是,因为认识不同和篇幅限制,关于第一波社会反响的文献资料未能以专辑形式尽数收入,这一点希望再版时得到弥补。📖

2020年7月30日
于北京之北

代跋：抛弃斗争哲学，让真善美扎根心灵

王本中

(师大女附中前校长)

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前身,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女子中学,1917年3月成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须办女子附属中学,是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首推,为实现全民教育,达到教育强国目的而做出的特别规定。从此,中国女子才能真正系统地接受正规教育,成为新时代的新女性。这所学校的首任主任(校长)是留日学生欧阳晓澜女士。我们应该记住这位创办者和奠基人的名字。

1931年,学校正式归属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师大女附中”校名始定。1932年,时任师大校长的黎锦熙,为女附中题写校训“勤肃信毅”,新式女校建校十几年后有了办校宗旨和校则依归。近百年来,一批批献身教育的智识精英,先后走进这所学校,为授业解惑、笃志

¹ 多元、宽容、理性、法制和波普尔的批判理性,是李泽厚在《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第371-372页。香港,天地图书,1997)中提出的,最为编者所服膺。

树人而殚精竭虑。他们培养的学生，有的毕业后毅然留校，承继前辈的事业，薪火相传，绵延不绝。

师大女附中随着时代变迁，隶属关系、校名校址屡有调整，但大格局和老传统始终未变。直至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校名仍为“师大女附中”，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是1963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的，那时一切听从党的安排，是我们的信条。我放弃做一名“华罗庚式的数学家”的梦想，到北师大实验中学的前身——师大女附中任教，一干就是40年，直到2003年退休。也许是身处激烈变革特殊时期的缘故，这40年的教育生涯，留给我的记忆，是12个字：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一言难尽。

1963年中至1965年初，对我来说是充满阳光的30个月，也是我非常舒心的30个月。那些岁月，尊师重教，教学相长，师生之谊，绵长悠远。

1966年的4、5、6三个月，风起于青萍之末，“四清”运动波及女校。我赶紧主动向我做班主任的高二2班学生，就“白专”道路作了“深刻检查”，希望得到同学们的批评，并重新赢得党的信任。

接着是文革狂飙突起的“红八月”，那段时间发生的一幕幕惨剧，像一场噩梦，至今想起，还令人心悸。胡志涛校长被打断脊骨，卞仲耘书记更是被群殴致死。原工作组时期的革委会成员刘进等人向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报告，得到的回答竟是“死了就死了……”我后来听说这个情况，不禁愕然惊悚。一个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老共产党员，被学生活活打死，这么惨烈的事件，女附中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丑闻和校耻，市级最高领导竟给予如此冰冷的回应！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到底是怎么了？虽然这一念头转瞬即逝，但由此，也让我的思想发生微妙变化。

我暗自思忖，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的老师、校长都是牛鬼蛇神吗？

我们常说“无条件地服从党”“做党的驯服工具”“做共和国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现在，全国乱成一团，我们还得无条件地服从指令，去乱上添乱吗？

文革结束后，我更多的思考开始了。

我在思考：“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这些被融化于我们这一代人血液中的“忠诚宣言”“做党的驯服工具，做共和国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些被融化于我们这一代人骨髓中的“钢铁誓言”，还要坚守吗？

我在思考：教育与政治、经济、社会虽然有着必然的联系，但一旦失去其相对的品格，

一旦成为“政治的工具”，沦为“政治的奴仆”，就有可能把青少年纯真的热情、炽热的激情引向“恨与仇”的深渊！导致“对抗”“暴力”甚至“屠杀”！历史的教训如何才能不再重演？

我在反思：“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真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战胜一切的“法宝”？如何打破“大救星，救世主”式“唯最高领袖是听、是从”之精神枷锁？如何冲破“唯马列为永恒真理、绝对真理”的思想牢笼？

这本书里的一些文章，就是很好的反思。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女附中的一些同学，已走得更远些。她们不仅深刻反思了她们在文革中的作为，而且以实际行动，为卞仲耘校长塑像，并公开向受害的老师们表示了道歉和忏悔。这是不可小觑、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是她们做的一件大好事。这也是我愿意担任主编的最根本的原因。

至于我本人，也有一点想法和同学们分享。我觉得，我们这代人，乃至我们的子子孙孙，必须坚决地、彻底地抛弃“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所谓“斗争哲学”。斗争哲学，实际是邪恶哲学，是毁灭哲学，必须视之如蛇蝎，弃之如敝屣，与之彻底决裂。斗，其乐“无”，其途“穷”，斗来斗去，斗来的是穷困潦倒，是穷凶极恶，是穷途末路。这是已被历史证明了的一条铁律。

我们已经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和平、发展”之路！我们要化对抗为合作，化冲突为和合，化干戈为玉帛。不延续恨，不积累仇。让善扎根心灵，让美撒遍大地，让爱洋溢人间！📌

推荐语

第一卷

文化大革命是一段需要不断加以审视和反思的历史。目前却对这段历史存在着诸多的记忆分歧、扭曲和遗忘，从而导致巨大的认知反差和对立。因此重建历史是一项非常困难而又极为必要的任务。如何写出“信史”？可能人言人殊。但留存尽可能丰富的史料，不回避多元的视角，不掩盖互有出入的记忆甚至相互矛盾的证言，容纳对同一事件或人物的不同观点，以供后人调研、评说，是史学工作最珍贵的价值。此书，恰恰体现了这个价值。

——牛大勇 北京大学历史系

1966年“红八月”，卞仲耘，北京著名女子中学的校长，被一群女学生殴打致死。这个事件具有特殊的符号意义，一直格外受到关注，成为那场革命的一个缩影和注脚。这部书呈现了一群亲历者和研究者打捞记忆、探寻真相、反思历史、伸张公义的坚韧努力。这里可以看到有温度的文字、有力度的思考和有勇气的担当。这是一部历史之书，也是一部当下之书。半个世纪前的火山灰烬至今仍滚烫灼人，这部文献的出版也因此更加弥足珍贵。

——刘北成 清华大学历史系

卞仲耘之死和文革初期的暴力已然成为了文革研究领域备受瞩目的事件之一。三卷本收录了从1966年夏天至今的文字、资料与各方争鸣，重现了记忆进入历史的动态过程，继而引出了教育与人性、真相与和解、正义与法制、故事与历史之辨等诸多发人深思的重要议题。本书是亲历文革的一代人对于往事的沉重回望，记录了一代人对于历史遗留问题的梳理与思索，更饱含了他们对当下乃至未来的诘问与展望。

——傅蕾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

第二卷

“八五”事件是文革暴力的典型，从不同视角研究这一事件是了解文革的一个窗口，围绕这一事件的争议是国人对文革及现实态度的集中反映。此书汇集了这一事件的历史资料、亲历者见证、学术论文、社会评论，是了解这一事件以及整个文革的必读书。

——金光耀 复旦大学历史系

北师大女附中学生打死校长的事件，震惊世界，影响深远。这三卷本呈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和社会反响。为历史留下了记录，为研究提供方便。它在告慰卞校长的同时，也向这个昏庸而轻狂的世界，展示出难得的清醒和担当。

——迟淼 法国洛林大学传播学院

今天，北京的胡同游是最受游客欢迎的旅游项目之一，每天有无数的游客徜徉于这些街巷之间。但就在这岁月静好之处，发生过最野蛮的城市杀戮：1966年夏季，少男少女在崇高目标的指引下打死1772人。卞仲耘的受难标志着这场疯狂的开始。

——崔金珂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东亚系

早在1970年代，“乌合之众论”在西方学界已经受到质疑和批判。研究发现，动乱中的民众是理性的，他们的行为不能完全归咎于外界的影响。这就提出了文革中民众非理性行为的原因和责任的问题。北师大女附中老三届为中国民众反思文革树立了榜样，这本文集的思想意义也因此得以彰显和升华。

——乔晞华 美国社会学学者

第三卷

在中国历史上干各种反文化的事，大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造反者。可到了文革，率先干这种事的则多是来自精英学校，出身革干的红卫兵。他们身上的“红色基因”是通过一系列反智主义的政治运动打造出来的。秉承这一基因的师大女附中的学生虐杀了自己的校长。这套文集详尽记述和剖析了这一血腥事件。

——单少杰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红八月”只是十年浩劫中的一小段，卞仲耘之死只是无数文革冤魂中的一例。然而这一例却具有独特意义：它发生在培养“红色接班人”的著名女子中学。如今有人想追寻历史的真相，有人想编出符合自己想法的故事，有人则竭力希望人们不再写、不再说、不再想……本书为后人了解和研究这一事件汇集了尽可能完整的史料与不同角度的评说。

——何蜀 文革史家 《昨天》主编

雨果在谈及他小说中的人物时曾说：“过去永远存在，这几个人就是历史的一面镜子”。感谢这套书的编者，提供了这样一面镜子。我们从中照见了远去的芳华、纯真的追寻、热情的奉献；还有迷乱的灵台、夭折的青春、枯萎的生命，以及幽暗的深渊。在充斥于世的遗忘迷雾之中，我们更照见了仍然在坚持的撕裂灵魂般的拷问，在瑟缩与战栗中坚忍的反思。所谓希望，就是这样的吧。

——丛立新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学术文集】



启蒙 美学 文化 论 集

Enlightenment, Aesthetics and Culture

毛崇杰

作者简介

毛崇杰（1939—），生于上海，祖籍湖北钟祥。196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就职于科学出版社任编辑。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蔡仪研读文艺学、美学专业，1982年获文艺学硕士学位，就职于文学研究所理论室任研究员，2002年退休。从事美学、文艺学、哲学与文化研究，主要著作：《席勒的人本主义美学》《存在主义美学与现代派艺术》《20世纪西方美学主流》（合著）《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3）《颠覆与重建——后批评的价值体系》《走出后现代——历史的必然要求》《实用主义的三付面孔——杜威、罗蒂、舒斯特曼的哲学、美学与文化政治学》《文化视域中的美学与文艺学》。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论文集，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后启蒙，第二部分讨论美学，第三部分

讨论文化。第一部分试图通过对后封建时代的描述，揭示毛泽东意志论造成的深重苦难。第二部分试图通过对中国美学史的梳理，阐发真理与价值以及美学上的本质主义。第三部分试图通过对当代中国文化的描述，揭示后极权政治与权贵资本的勾结。本书以跨学科的方法和跨文化的视野，用专论与散论相结合，理论思考与现象描述的结构形式，探讨民族主义与大同思想、民主宪政与独裁专制、开明与蒙昧的冲突。近年来我常想，自己最后一段人生路是否会走在历史之端头？朦朦胧胧似乎见到前面有点光……

光明不远了吗？黑暗到光明，又黑暗，人类在时间的历史中经过了几多隧道……短暂的人生所见有限。回头看看走过来的路，在“红领巾向前飘，少年儿童志气高”“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歌声中长大……去年，2019年夏，耳边又响起“东方红，太阳升”“社会主义好”，那是所在小区大妈、大爷们为迎接70周年在唱……南方那边，香港上百万民众和学生为民主、自由、人权走上街头……

摆脱黑暗，追求光明是生而为人自由。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也是生存的最高价值，启蒙承担着这一历史使命。自由作为天赋人权在桎梏的现实中是通过奋斗对专制极权的摆脱。当下之中国与世界正处于文明与野蛮、黑暗与光明、正义与邪恶激烈交战之关头：

祖龙虽逝魂犹在，腥红帝业有传人，
厉疴助虐众生泣，楚歌响时晨星升。

生年不过百，总怀千载忧。尚存余力，召唤启蒙。启蒙，一首唱不完的歌，一曲无休止的舞！🎭

后记

徘徊与零乱：忿忿谔谔四十年

每个人生都在历史大潮中起伏。思想者心灵的求索，为这个大叙事增添着一笔一画，以点滴水珠汇入汪洋大海……

2019年迈进了人生第80个门槛，我的治学之路恰恰与改革开放同步合拍，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的今天。在为此生划上最后一个句号之前，回首流逝的岁月可以说人生的目标差不多都实现了，为什么说“忿忿谔谔40年”，且听我道来。

2015年寻访童年故地安庆，顺便到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做了一次讲座。结束后闲聊中，

方锡球院长说我60岁之后的成果更为出色。当时对此话并未在意，后来琢磨，60岁正是我研究工作40年之中界，也恰恰是我人生与事业一个转折，或可用史、论转换概括前后期研究方向的发展，后期跨越学科进入文化研究与社会批判领域，眼界、视野有所开阔与拓展，对深度亦有更高追求，归结为以下特点：（一）从古典美学到现代与后现代的美学艺术学某些重大问题的关注引向历史理性批判的自觉。（二）拓宽学科性研究视野进入跨学科文化研究展开为社会批判。（三）强化对马克思主义向整个体系纵深研究，更加明确以“回到马克思”作为启蒙之思想武器。（四）以“回到孔子”作为后启蒙精神批判后封建之本土话语。

40年来主要成果大大小小94题，主要论文多集中于已版八部专著，及本年待版者，共约300余万字。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是歌，是舞，皆为“生民之多艰”。仰首叩天，“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屈子之问永在心中徘徊与零乱。忿忿谔谔，明知生年不过百，无奈总怀千载忧。

一、人生大惑：大学 饥肠 欢歌

我起步不是一般的晚，比起许多同行从业晚了约20年，年龄差距虽不大，都为前辈。40岁那年，1979，我正读硕士研究生第二年，在给美国表妹信中说，“不惑”之年的我正“大惑”，这里面有些小故事。大学本科为地质勘探专业，从小酷爱文学艺术为什么走上理工之路呢？此非心之所愿。1958年高考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法语系未取。为适应“大跃进”的形势各地纷纷新办一批高校，招生办发布第二次填志愿的机会。“是那山谷的风吹动着我们的红旗……”，带着为祖国探矿寻宝的豪情，夹着游山玩水的杂念，便在南京地质学选项上划了勾。第二年该校就办不下去了，并入南京大学地质系。我乘机给院长赵铎写了封信请求转中文系。高考第一次落榜生多出身非“红五类”，有些非常优秀，后来在工作岗位上成为业务骨干，林颂恩当上了总工程师，安芷生成为院士……当时进入地质学院皆非心所愿，整顿稳固专业思想是重之所重。我个人主义膨胀不识时务，转系不仅未准，班级还开了个批判会，惩一儆百……

南京大学乃旧中央大学与金陵大学合并，地质系有不少资深专家教授，多少给同学们一番心理上的抚慰，总算在饥肠辘辘中挨过了大学岁月。1959年中央庐山会议掀起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我们是听传达，谈领会。当时城市里居民平均粮食定量供应30斤左右，饥饿的感觉始终伴随着正在成长的我们。一次我借上自行车到高中同学陈德骏所在的江宁县农

村买了一大袋胡萝卜回来解馋。另一位高中最好的同学王守镛家在句容农村，因先天性心脏病没有毕业回家在农村中学当教师。我到他家玩过几天，他母兄都是朴实、淳厚的农民，给我留下的深深的印象。一天他到学校找我，说他的母亲饿得不行了。地质系每年两个多月的野外实习能得二两左右粮票补贴，我把节约下来的一点粮票全给了他……不久他母就去世了。当时我们对各地农村中大量饿死人的消息毫无所知。

1939年我生于上海，10岁左右就随母亲去安庆。对父亲不是很了解，只知他青年时代离开原籍湖北钟祥求学，凭英语考进上海海关税务司，端上了“金饭碗”。他性格内敛且暴躁与母亲感情不和，但母亲说他为人正直，心地善良，讲究义气，帮助了很多穷亲戚。1946年他得罪了上司，被贬到云南腾冲，怒而辞职，错棋一步全盘皆输。“屋漏却遭连夜雨，船破偏遇顶头风”，不幸接踵而来。国民党垮台前强力发行新货币，家中黄金、美元全部兑换金圆卷之后大贬值，同时入户银行倒闭，陷入破产境地，我与姐弟随母迁往安庆。母亲出身书香门第，外祖母是个才女以工笔花鸟见长。母亲也酷爱文艺，教过小学，襁褓中她常唱的几首摇篮曲至今回响于耳际。她还会唱一些京剧，听她讲电影戏剧故事是最大的乐趣。当我能读时，她给我买来上下两大本汉译《格林童话集》《儿童良友》是我常看的刊物。失业的父亲从舅舅那里借来本钱与朋友合伙往返沪港做生意，不幸被害（在货物中被同伙偷藏毒品），一度身陷囹圄，从此一蹶不振，后来被作为无业人员迁往甘肃开荒种地。那些年母亲总往拍卖行跑，后来姐姐当上小学教师有了微薄的薪金对付着维持生活。我自幼体弱多病，到小学四年级时患上了肺结核，1951年迁往南京，休学两年后读完中学。大学期间每月可得8元饭票助学金。1960年父亲来南京在校园匆匆见了最后一面，我把仅有粮票给了他，此后便成永诀。父亲的一生是不幸的，还不到60岁死于当时普遍缺乏营养的浮肿病，而他生地却得名长寿乡。他是在贵州织金县我伯父处去世的，堂弟来信告知死讯……2019年深秋我去了那里寻根问祖。

在勒紧裤带情况下，学校的课程缩减了，文艺活动比政治报告多了起来，莺歌燕舞或可填饱饥肠。1960年《人民日报》首次发表了毛主席的一批诗词。我很痴迷，在宿舍情不自禁地模仿湖南口音诵读，一遍又一遍，很快全部背下来了。一种心灵与激情所驱动的偶像崇拜并非智障与盲目，却极可能是蒙昧的原因。当时我灵感冲动，没有任何作曲训练硬着头皮把《沁园春·雪》以简谱作成多声部领唱与合唱，经南京前线歌舞团专家指出和声对位上的问题，略加调整后由校合唱团演出，竟然非常轰动。2015年在南京同学的聚会上，阮雍生还唱了几句，令人唏嘘……当年我主要活动在话剧，与袁志梅执笔创作了一个剧本《鸡头迎阳叫》。

内容是地质系与地方老乡结合找矿支援大炼钢铁，饿着肚子还在歌颂“大跃进”。请来省话剧团导演现场指导，获高校会演大奖。剧本以集体名义发表于《江苏戏曲》，我与袁志梅各得二元人民币奖励。那些年在舞台上风头出足，奖状多多，不是荣耀而是羞愧……

当年，王守镛认为中央在“大跃进”政策上犯了错误，我仍然背诵标准答案：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了饥荒，“三面红旗”的成绩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的错误也是下面干部造成的。虽父亲也蒙其难，然而要说毛主席领导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会犯如此弥天大罪，打死我也不信……守镛见我如此冥顽不悟也就无语了。他长我5岁，晚至文革中方成婚，我送他的礼物是一部袖珍合订本的《毛泽东选集》……从高中到大学在政治上如此判若两人，可见洗脑功效如何神奇。

1961年之后“大跃进”的错误仍然未公开揭露，而政策调整悄然进行着，党政军各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相继甄别，摘帽。班党支部书记陈和海专门找我谈，表示那年我提出转系要求不能算什么错误，开批判会是不合适的……这些迹象反映了当时上层在缓解矛盾之动向，有些事在回忆中方有所悟。毕业后，1962我被分配到了北京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当编辑，业余就读了电视大学中文系。当人们挨饿，大量死人时，阶级斗争较缓和。单位每周半天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同在校也差不多。不过，有阵子一反以往历次运动时摩拳擦掌、怒目相向气氛，鼓动同事之间“评功摆好”，相互“吹捧”到“面红耳赤”。然而，刚过几天吃饱肚子的日子就开始折腾了。1963年与苏联决裂，以“九评”开始公开批判其修正主义，发行《毛主席语录》，学雷锋运动……江青委托林彪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文艺界陆续推出《千万不要忘记》（我还在东城区文化馆排演此剧，担任男主角）《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话剧。同时打响了向《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毒草”开火的战斗。理论阵线陆续批判周谷城、王献珍、冯定等。艺术、学术一概化为政治问题与阶级斗争挂钩，火药味越来越浓直到文革……

接着是一言难尽的十年文革……1978年改革开放第一批研究生，我鼓足勇气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竟然有幸被录取了，在导师蔡仪门下攻读文艺学系美学，半路出家，先天不足，踏上“大惑”之新路。

从长期闭关锁国状态走出，家庭状况也随之变化。1986年儿子于北京四中毕业，天赐良机于为美国新英格兰音乐学院以全额奖学金录取。当时银行凭签证只允许兑换100美元，他于暑假到达无人接待，住过教堂吃舍饭也在地铁、餐厅拉琴挣钱……现已成为新泽西州著名小提琴家，常与乐团合作在音乐会上独奏经典协奏曲。这一切在改革开放前是不可想像的。

这时的我渐渐走出个人迷信陷阱，认识到改革是历史的潮流而非个人意志。对当时现状的官方说法叫“积重难返”“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一切带有更新的气象，而处处又透露出旧的痕迹，拜物重商之下，新的社会矛盾正在不断萌生，激化。狄更斯笔下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氛围再现于眼前，人们引用《双城记》开头的話描绘当时现状：“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种状态与我的人生“大惑”交相感应，我以把时代“最坏”的东西化为“最好的”作为学者的使命，不是唯唯诺诺而是忿忿谔谔。

读研期间正是“美学热”中几派重“开战”之时。受当时李泽厚实践美学的影响，在第一学年论文中我对导师的观点有些异议。蔡仪没有批评还鼓励我，给了优等成绩。从导师得到的最大收获是治学态度与方法，当时他对我们八名学生谆谆嘱咐，做学问写文章，一是要有理论根据，二是要有事实证据，忌架空立论。过去自以为文革中马克思的书也读过不少，实际上当时是把马克思的学说歪曲地纳入在“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极左框架之大氛围下的阅读。“大惑”正因此而来，一切需要重新开始。

当时美学界分歧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谓对美的本质的定义为焦点。于是对《手稿》我狠下了一番功夫，书已经翻烂了。终于认识到，“人的本质对象化”与“自然人化”不是对美的本质所下的定义。清理《手稿》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成熟程度如何；实践是否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后文革时期，人们含着泪水，抚摸着伤痕，在“人啊，人”呼声中，哀叹失去尊严、人格，痛惜那在屈辱中永远消逝的年华与扭曲的人性……

长期的思想禁锢，人们来不及消化种种“西学东渐”涌入新的思潮。李泽厚提出“人类学本体论的实践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建立其实践美学。我的研究揭示实践范畴可分以下几种：（一）《手稿》所批判黑格尔以绝对理念化为历史与世界的“精神劳动”；（二）马克思所说“卑污的犹太人的”活动也可归为一种特别的“实践”；（三）人的日常生活活动；（四）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实践”在于“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由此判定实践美学不是其自称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当时文学所所长刘再复追随李泽厚1986年发表了《文学的主体性》一文，引起文学界一场辩论。王善忠在一次理论室讨论会上指出，这种主体性与1958年“大跃进”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种主体性共同之处在于无视客观规律（大意）。王善忠的发言当即遭到何西来的反驳，当场这个问题并没有深入展开。

1982年硕士生毕业后，我留在文学研究所理论室工作，1986年我在《哲学研究》第3期上《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吗？》我澄清了有关哲学人本主义的一些问题，认为人是在

既有的历史条件下，不断的历史创造中，在现有的社会关系支配之下，以追求新质的实践摆脱种种旧羁绊的能动存在物。

第二学年我的硕士论文方向定为德国古典美学从康德到黑格尔枢纽性的人物席勒，为此我学了一年德文。我着重解读席勒对美所下的几个难懂的定义深入到其核心命题“美是自由的显现”，揭发他的人本主义美学思想——美是人的本质的外化，通过审美教育使人摆脱异化实现自由之本质。《席勒的人本主义美学》经修改提高，作为蔡仪主编的美学专著丛书之一，1982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席勒的美学专著，印数达5000册，这个数目在学术著作已相当可观。

二、从席勒到海德格尔——两部现代美学史

1980年代末，改革开放走过将近10年路程，由于权力寻租，官商勾结，吏治腐败，贫富两极分化严重，民众已不能忍受，社会矛盾达到白热化程度……当时马克思主义正为极左的罪孽受过，理论界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就像搞地下工作……”。我与钱竞、严昭柱、王仲、王庆璠、董学文等建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美学沙龙，多次聚会。1989年于《天津社会科学》第一期开辟了一组笔谈，“六四”之后便停了。

人文学者迷失在一片茫然、空虚之中，种种思潮冲突激烈。耳际响着“哒，哒，哒……”，怀着在谎言与鲜血恐怖中压抑的愤懑，我在1989年9月于《文学评论》第6期以《“动摇和失落”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命运吗？》一文分析了学界思想现状，指出封闭专制的封建主义传统阻障着我国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多元对话中的发展，其现实敏感性当即引起学界较大震动。特别是其中揭露了当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为什么反对这场动乱》文章的作者何新在有关论文中的常识性错误。何将我的文章印发给若干中央首长，以“动乱”翻案罪名告发我。当时所长王善忠及《文学评论》主编曹天成化解了险情，我得以免于灾难……耳际响着“哒，哒，哒……”，血色在眼前化开……

此后我从古典美学转向对现代主义的研究，关注当时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存在主义，到北京大学旁听了曾师从海德格尔的熊伟教授几次讲课，之后写了一篇心得。熊先生鼓励了一番并委婉地指出这篇文章对海德格尔思想发掘的深度不够。经过苦思，以sein(在)、Dasein(此在)、das seins(在者)等关键词认识到，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比人道主义更深一度在于，从虚无到物(在者)与人的(此在)，追求存在的“本真”意义。美即比认识论的真理观更深层之“真”的显现，是通过“思”达到诗意的言说。由之，被技术世界异化为“材

料”人，复归于作为“在”的看护者而非改造者，走出“无家可归”状态诗意地栖居于艺术家园。一时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人诗意地栖居着”等等成为美学界热门话题之一。

存在主义的另一个中心在法国，以萨特、卡缪为代表。卡缪以《西绪弗斯神话》象征世界的荒诞与生存的无意义，而萨特以“存在先于本质”“人是不能规定的”等命题张扬选择的自由，表现主体非理性之“烦”与“孤独”感。而在文学创作上重视社会批判功能与作用提出“倾向性文学”向资本主义开火。我以“多面的萨特”概括这些种矛盾。存在主义对现代派艺术各流派超越对异化到反审美的非理性的批判归之为“泛异化论”。1985年《存在主义与现代派艺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付梓，印数高达20000册。

1993年与二位同仁合作完成了《20世纪西方美学主流》（吉林教育出版社）的，我担任总论与存在主义美学部分，以美学作为一扇“认识20世纪”窗口窥视在种种全球性的世纪末之焦虑。以现代人本主义、形式主义与心理主义三条线索十大潮流论述20世纪西方美学，其中贯穿着对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峙，非理性主义，从主体泛化到主体消失。张德兴负责分析美学与新解释学美学。马驰分担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部分。这是当时同类书中规模最大的一部，被广泛用于教学，出版社背着我们多次重印，分文稿酬未付。

在20世纪以来的现代哲学与美学思潮中的主体性问题与现代物理学理论密切相关。我花了大力气研究了艰深的牛顿经典物理学与爱因斯坦相对论及波尔的量子物理学，从认识论深入到微观世界的主客体关系，以及作为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互补作用。这也是与同类现代几文美学史不同之处。

20世纪中下叶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从上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是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这之后世界历史进入后工业文明。在“后学”热浪中，欧美出现“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影响较大是弗里德里克·杰姆逊，他把后现代归为晚期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即其“文化逻辑”。在1995年《文学评论》第四期的《文化视野与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一文，我提出在“解构主义的解构”中“马克思主义的回归”，这是贯穿于后来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也是新马克思主义代表杰姆逊在后多元文化的格局为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优先地位”之辩。他指出“理论家对权力的依附所赢得的，恰恰也就是他所失去的”，这对于商品拜物教，人的异化，腐败与官僚主义的现实批判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消解对现实的非理想化权力的批判功能，马克思主义就失去自身。（我与他的交结请参见上文《访谈录》）

紧接着参加了由王善忠主编四卷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工作。我所写的第三卷为《20

世纪中下叶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全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推出。对于我这是项有连续性的工作。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种种哲学流派的影响下的发展，从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与卢卡奇，经过法兰克福学派，直到新马克思主义的杰姆逊与伊格尔顿。卢卡奇早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要害在于他把自然划为社会的范畴，否定了主体人之外客观世界的自在性。后来他多次对该书进行了真诚的自我批判，认识到自己早期理论中“错误的东西也是最有影响的”。这一立场的改变决定了他后期的《审美特性》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写作，强调世界“物质统一性”，把反映论与人的存在的社会性之本体论结合起来；使“人化”与审美艺术的“反拜物化”统一起来，成为他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坚实基础，如关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等。本书还较为详尽地论析他在30年代布洛赫与布莱希特关于表现主义的一场广泛的争论。

20世纪中后期，美学渐渐从学科性游离融入跨学科之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法国出现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以表现的因果律抵制枢机的因果律以及多元决定论替代经济决定论。在美学与文艺理论上是马歇雷与戈尔德曼。在英国的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是文化唯物主义的雷蒙·威廉斯与伊格尔顿。

杰姆逊是本书卢卡奇之后的第二个重点，论述了他的以“政治无意识”描述不在场状态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与后现代主义批评。他概括出四种文学阐释“深度模式”：黑格尔、弗洛伊德、存在主义与符号学，他对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归结为“在历史中辩证地思考历史”。在东方与西方中心主义的紧张中，受后殖民批评的影响，他把第三世界与中国文学归为“政治寓言”，对此我进入了辨析。

中国的后封建及后原始积累状况下的启蒙，马克思主义之权力话语化变质，“回到马克思”成为我40年后一半的主旋律。

三、半生中的后一半

20世纪末年，我进入了40年的下一个20年，60岁的我开始人生的又一个新起点。后20年成果的数量比之前约加了一倍，这里有我的妻子的一半功劳。在个人生活上，自1986年家庭婚姻破裂，渡过了13年单身生活，1999年终于找到了我的另一半——李静（实名李桂荣）。这变化与事业上的新起点同步。她像一缕晨曦照亮了我长达13年“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的暗淡日子。不仅外在的美，她生性活泼而开朗，带有傻气单纯、真率到透明。

我们是在妇联办的一个单身俱乐部相识的，一次聚会中一位朋友当众说：“李静这样的，

凡男人都喜欢”，岂止男人，女性也愿意和她在一起。一位老友祝福说“千年修得共枕眠”“人好就命好”……也有朋友为我捏把汗，相差19岁，我又如此寒酸。她的一个体己女友纳闷问道：“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她回答“得到的好处多着呢……”。春风和煦，时而也会有风暴，她是“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双子座转眼就雨过天晴，而射手座的我却常要打一会儿“持久战”……良善、坦诚、理解和宽容维持我们20年来恩爱如初，谱写了一曲半生缘，直到生命的尽头。家庭生活的美满遮蔽不了耳际时常响着的“哒，哒，哒……”，血色仍在眼前化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20世纪末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资助，1999年以专著《颠覆与重建——后批评中的价值体系》出版，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一等奖。

价值理论是文学批评的研究的一个哲学视角，文学与批评的一般规律与真善美表现为历史的、道德的与逻辑的有机统一的关系，既非唯美、唯政治、道德至上，亦非价值虚无主义。首先要从哲学上澄清真理与价值割裂的混乱，泛论真善美的价值陷入“价值是有价值的”之同义反复。我在《哲学研究》发表文章指出，把真理分为事实真理与价值真理是以功用性价值消解认识论真理。实践标准作为实现真理的手段是建立在承认真理的客观性上，这与日常生活学说的“猫论”有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由于对客体“好”作为评价若与认识判断之真理观断裂便转化为反命题。就经济改革的现实而论，社会财富是价值问题也包含真理，做到“少数人先富起来”并不难，如果“共同富裕”既是价值更是真理的话，未实现这个目标就谈不上“好猫”。

文学与艺术的价值在于内容上的真与善以外在形式上引起主体的美感。人对美的艺术在形式上的创造，在这个意义上美表现为“给质料以形式”并不归结为形式主义。创新内容寻找着新的形式，同时形式也追求着新的内容。文学批评作为价值判断归结为对理性的批判与批判的理性。理性的力量在于对外部世界及其自身的批判性。对理性的批判是从理性自身有限定性引发的否定。批判的理性所决定的文学的人学本质于内是合乎人性、人道的善，在外部是服从社会改造和历史前进要求的真，统一体现为“反拜物”性。人文精神中批判理性的消解是后现代“主体消失”的特点。我归结后现代之，在创作现象为“从受虐到自虐（自我非人化）”，从有“梦（作为某种美学理想的泛指）”有“魇（作为现实之非人化的泛指）”，到有“魇”无“梦”——“无梦”也“无魇”。这些特征与后现代对启蒙理性的挑战有关，非理性在美学上表现为现代主义反审美，在创作上理性与非理性交错交织更是复杂的，要避免对非理性主义批评的简单的唯道德论。理解是批判理性的最高准则，是以理性点燃理性即

启蒙，这就是在颠覆中的价值重建。

批判的理性指向现实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变革化为历史理性。本书专门研究了百年中国的民粹主义与启蒙主义这两种思潮的纠结问题。两者都属于号召民众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主义民主主义思潮，我指出它们更根本的区别在于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态度，前者主张从小农经济基础上建构社会主义。沿着启蒙理性与历史理性的思路我提出了“走出后现代”命题。

四、走出后现代

新世纪第一个10年，我交叉完成两部著作《实用主义的三付面孔——杜威、罗蒂、舒斯特曼的哲学、美学与文化政治学》《走出后现代——历史的必然要求》。前者可以说是西方现代美学史的延伸，针对实用主义以语言转向，文化转向重新崛起及其与后现代主义的关联所做的探讨。肯定了实用主义对文学的再现与表现统一及对大众文化的张扬，批评了其致命的误区——价值与真理。舒斯特曼认为：我们人类并不是为真理，而是为感性的和情感的满足而活。我指出，“为真理活着也是愉快”，天下所有人都为活着而感到“感性和情感的满足”那个就是价值与真理的整合，也就是真善美的。这是从后现代对现代性反思中“走出后现代”所完成的历史终极目标。

《走出后现代——历史的必然要求》系1999—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之成果。结项之后次年，2015年匿名评委外国文学所史中义找我问起出版的情况，并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推荐。然而签约交稿后出版社要我砍去约1/3篇幅，我断然拒绝便遭毁约，并无理拒付违约赔偿。古道热肠的史中义又为我推荐到河南大学出版社。然而，院老干部处却以修改增加未经评审内容为由扣压了出版补贴。河南大学出版社总编张云鹏慷慨允诺以二万元自费承接，80多万字只字未删。钱中文与史中义二位先生分别写了序言，历经阻扰该书终于2009年呱呱落地。经文学所书记包明德出面与院交涉，索回了出版补贴，文学所理论室为之组织了一个小型座谈会，与会同行给予极大鼓励。金惠敏说它篇幅过大应加分割，这意见是对的，内容庞杂难以卒读，不利发行推广，或许这也有适于全局通览的好处。2017年在中外文化与文论学会的微信聊天群里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的刘圣鹏教授提出，该书当列为指定教学重点参考书，岂知其之出笼所经历的艰难曲折。2012年我试探性地申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不出所料，权力部门根本不予理睬……

我认为“走出后现代”是历史理性绝对命令式的必然要求，资本主义怎样走出晚期阶段。后现代之后历史怎样走下去，有人提出新的现代性，第二现代性等等，我认为这是在历史之

“总体”意义上还原过去，面对现状，向着未来的问题。在解构语境下，“后马克思文本”是马克思主义“危机”与“复兴”双重机遇。在反本质主义以虚无主义对传统经典的挑战下还原马克思文本，首先是梳理文本主义、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关系，澄清“本质论”与逻辑实证主义本质主义的混淆。

资本主义体系的研究，是为走出后现代的契机，本书详尽地研究了这个问题。1870年代俄国民粹主义者向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作为历史发展的“卡夫丁峡谷”是否能够跨越的问题。马克思之前已有结论，作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是不会退出历史的。历史学家沃勒斯坦在《自由主义终结》一书中把通过“技术现代性”实现“解放现代性”之列宁主义路线归结为“自由主义”加以批判，他所提出的“有托之乡”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的。我在书中对后现代乌托邦的几种主要形态展开了研究，并把眼光转向境界。

1995年英国汉学家戈登·怀特《中国的社会主义以及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一文认为中国的社会体制是四种形态的混合体：（一）“混乱的霍布斯式的资本主义（Chaotic, Hobbesian Capitalism）”，（二）“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三）“新工业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四）“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我接过他的话题结合吴敬琏等提出的“权力寻租”指出，“权贵资本主义”以“权钱交易”方式进行权力的“私有化”“资本化”和“商品化”。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批判，显然这就是本书在出版上遇险的原因。

以日常生活审美化出现的文化消费主义为后资本主义的一大特征。我指出，奢侈品作为一种超离功用和审美品质之外的符号消费之审美附加，成为一种显示身份、地位和财富观念联系的浮华与虚幻的“快感”之满足，而不同于实在的审美快感的满足。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此外美学还遇到在高新科技与艺术终结关系问题，两者在“进步”意义上的错位。超真实、类像、符号生产、内爆，以及文化消费主义之下，审美文化背离了“生产完整的人”之进步文化的使命。

全球后现代思潮与中国古代思想传统在“大道既隐”与“大道之行”强化的张力之中对接，危机与希望与并在的历史境遇。批判新儒教的“政教合一”教权化的主张，将儒家原典纳入新的语境进行广泛对话，以对全球化的一种新的普遍主义做出应有的贡献。对于“大道”的再思考之全球思维是为知识者在“认同逻辑”与“反抗逻辑”之间通过对于世界与本土的“知病”“病病”，寻求“是以不病”（老子）之径。超越要求以后现代“去中心主义”还治其“自我中心主义”，达到消解一切中心主义，以全球知识分子身份完成新的自我建树。孔子思想体系之核心“礼学”与“仁学”。“礼”不是形式而是整个上层建筑，“仁”是意识形

态。两者统一为“道”。通过“选贤与能”“举直错诸枉”“选于众”，使“不仁者远”。故“孔孟之道”不是封建专制极权之道而是尧舜民主平等之道。儒学不是宗教信仰而是一种民主政治伦理哲学，是对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精神之传承。老子说：“执大象，天下往”是一种从整体上思考世界和历史，从过去与现在关系来探索人类未来命运之“大象”思维，即我提出的“全球思维”。

关于上古时代的“选举（选于众）”制度，多数注家与论者普遍认为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选拔，我通过自甲骨文以来的古代汉字结构论证“选举”二字连在一起完整的意思就是上下结合，“行走选择，众人给予”。纠正这一长期被淹埋在误区之中的民主传统。进而匡正了中国古代只有民本思想没有民主传统之二元分裂误区，把毛泽东的“百代都行秦政法”改为“全球都行尧舜道”是历史对于未来的必然要求。

孔子为《易》作传，申论“天命”与“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及《易》预测命运的基本原理。孔子提出“顺数”即历年对凶吉祸福记录统计出概率使经验成为后验；“逆数”是从后验到先验对命运的预测。“畏天命”乃知“道之将行，命也”，规律的必然性不可抗拒。孔子的真理观在于“中庸”“公允执中”“中正以观天下”是为了取得对世界一个正确认识。

本书最后我从关于“中心与中心主义”问题指出，当下以“中心/边缘”“东方/西方”对立之非历史化倾向。“中国能不能说‘不’”是个以“不能中心化的反中心边缘意识”之民族沙文主义煽情的假问题，以自我中心的放大形态折射出权力中心话语。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大陆留学海外的一些学子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特殊东方群体（民族主义新左派）。他们某些人在外域取来具有最大冲力的东西，在本土沿着所能遭到阻力最小的方向进行移植。因此他们在外域得到的东西恰恰是在本土失去的权力合法性批判。

从中国申办奥运成功以来直到2008年正式召开，全国上下陶醉在一片民族主义自豪感狂欢之中，此间对维权异见打压的力度也强化，人权状况随之恶化，种种社会思潮激流冲撞。我常去景山公园见到一群人定期聚会唱红歌，批判改革，甚至打标语，喊文革口号；另一拨与之争辩，有时激烈到肢体冲突，情景很像文革，令人震惊。我也常在“乌有之乡”网站上看到同样情绪的流露和宣泄……

2007年3月16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指出：“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由此在全国媒体掀起了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乌有之乡”网站发表了上百篇批判文章，认为普世价值是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

攻击提倡者为“资改派”，其主要撰稿人司马南文章称“舞‘普世’之剑，意在沛公”。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在2009年度工作会议上讲话题为《市场原教旨主义与“普世价值”不是改革的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3月19日）。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李崇富、侯惠勤等相继在报刊发表声讨普世价值文章。

在激烈的交火中，2007年我在“华声在线”实名“精英博客”及搜狐网上陆续发表博文，至2015年达289篇（多为时评，随笔、杂文，也包括论文摘登、摄影与少量转载），访客达2,266,257（该网站于2019年停办）。矛头主要指向以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极左思潮与极权主义，伸张正义、人权及普世价值，如《马克思恩格斯论普世价值》（2009年2月10日）、《“五四”精神与普世价值》（2009年5月5日）、《极端民族主义是怎样炼成的？》（2010年2月24日）

席勒曾说自己“追随康德花了10年，摆脱他又花去10年”。粉碎心中的偶像往往是一个艰难痛苦的过程。2015年9月29日我在一万多字的博文《什么是虚无主义》中指出：“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就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概括为一条就是否定客观规律的唯意志论……从政治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到道德虚无主义，包括“大跃进”、文革等实践都建立在此哲学思想之上”。跨入新世纪后，连续发《评新左派》三篇，以马克思恩格斯对1840-50年代革命以及巴黎公社的总结为理论依据，回顾改革开放10年来以的思想潮流：新时期初“全盘西化”的经济自由主义滥觞，提出了一系列带有原始积累特点的主张与口号，概括为以“少数人先富”为目的之“效率第一，兼顾公正”。

“哒，哒……”之后，90年代在后现代“去中心”之东方主义影响下，自由主义分化，新左派崛起。新左与老左的差异在于“海归们”从西方贩运了一些东西，然而他们从根本上把西方左派许多合理的因素剔除了，所剩只是文革理论加上新的后殖民话语的包装。在新的全球化浪潮下，新老左派在对文革与民粹主义认同上趋于合股并与民族主义及鹰派势力汇流走向极端，以“去美国化”“反西方中心”强力抵制人类普遍价值。2016年来，我安装了手机微信，先后加入若干聊天群，得到更多社会思潮方面的信息，多年来同时与左及右的极端主义短兵相接。极右派张扬个体绝对自由，以弱肉强食的丛林为最高法则，赞颂殖民主义的功绩，奉慈禧为改革家，扬袁世凯抑孙中山，颂汪精卫贬蒋介石，以在日本统治下实现现代化之幻想否定抗日战争，以种族主义抵制世界主义而带有新纳粹主义倾向。极右以知识精英为主干戾气也很重，但在权势上尚未成气候；极左势力根于官僚极权与利益集团代表主流意识形态，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成为历史前进的主要阻力。这两种极端主义在反对普世价值上

合流，撕裂了整个社会，使改革举步维艰。

2006年我们在山东乳山海边买了房子，每年夏天到那里住上几个月。2009年小区几位爱好文艺的朋友组织了文艺队。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时，媒体造势，各地纷纷响应，网上建立起《红歌会》……2015年我写了《远离红歌，拒绝愚昧》一文指出，重庆提倡的“红歌”是极左势力以文革回潮为目的，以反审美的政治口号作为愚弄民众的洗脑工具，发于包括中外文论各聊天群。我在小区以每周两次教唱世界名曲。迄于2018年在小区举办了十届消夏晚会。小区退休工人王德泉是极佳男高音曾在全国化工系统歌咏比赛获奖，但掌握曲目多为红歌，2018年晚会上成功演唱了《茶花女》中的《饮酒歌》，我为他打印歌谱，下载伴奏，安排伴舞……

五、去学科化与返学科

新旧世纪之交以来，在文化研究作为“后学科”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合法性的质问中，在肯定学科边界前提下我主张学科之“学科间性”及学术与非学术之“学术间性”，相继发表一些文章整理汇总于《文化视域中的美学文艺学》一书（2013）。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与学科性论辩中，我认为两者统一在“为了人及世界”主旨之下，学科边界的颠覆与重建正是为求真意志驱动，思想的解放沿着突破一些既定界限的同时又设定一些新的界限的方向运动。

本书以美学与文艺学的哲学基础问题全面回顾了40年来哲学界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几次大论战，哲学界有人提出让“马克思文本永远沉默”以“实践唯物主义”对马克思的哲学进行唯心主义改造，我坚持解释学原则为马克思文本争取对话的权利，作为为美学文艺学的哲学基础。美、审美与美学的发生之历史与逻辑起点为“无”，不是“无美”而是“无名”之“天地有大美”自在状态，直至进入与主体建立起审美对话关系。“美”从人作为主体之味觉到视觉，从好五味，到好五声、五色，是人的内部自然五官感觉“人化”/“诗化”的过程。

在“去学科化”语境中，美学遭遇“终结”与“消失”张力，一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二是生态美学认为自然界整体美，两者以美之泛化导致一切非美。我指出，真、善与美不可能无条件地相互替代而取消一方，而在一定条件下互动与转化。真作为“科学美”、抽象美与认识论之美以及善作为人的内在伦理美与社会美都为内容，它们给人的满足不是审美快感，外在的感性形式是它们成为审美对象决定因素。美学要超越自身就越是要把自身限制在科学

的学科性之内，保持自身独有的“行话”方能驰骋于思想自由、文化批评的广阔天地。

我提出，文艺学在社会存在本体论基础上“一”与“多”关系的多重本质构造式应对学科合法性危机。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审美的形式，在“为人”的自由目的上，把“载道”与“反载道”“自律”与“他律”，反映与表现及游戏娱乐、政治的工具，等多重本质统一起来，避免一元论的简单孤立与多元化的碎裂。

中国古代美学文艺学并非“知识化石”之“绝学”，而是作为一个有生命延续性的活体存在，属于学科合法性中的一个民族话语问题。唯有走出“体用”框架以及“自我/他者”中心主义二元对立模式，方能进入多元文化平等对话平台之健康道路。中国古代文论不是零散的范畴观念的之拼凑，可以成为自洽自足的体系，其之重构决定于其原生状态与初始性质“重新认识”和“回到”的问题。其有机统一性在于文化传统的思想维系，其现代性断裂表明它缺失科学理性统辖的学科化过程。儒道两家思想、风格相异，影响中国古代文学中对现实的“美”、“刺”两种互补模式，重建体系化“大文论”当以“载道”为主干，以批判精神相传承。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有边界阻隔之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更有普遍性诉求。刘勰所说“道之文”也就是西方的逻各斯与文学的关系，即中国古代传统哀民、愤世、忧国之道与自由、平等、博爱之人类普遍价值的关系，怎样在语言之“微”中见出其思想体系之“大”，是重构的重要环节。如“思无邪”是在艺术对真理的审美关系上以认识论为基底，以政治伦理为核心，以外在审美感性形式完成真善美三者，及文学的工具论与目的论统一。

艺术的繁盛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科技走向“高新”发展却响起“艺术死亡”的声音。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呈线性上升，艺术“进步”的概念只有在同一参照系之下才是有意义的，前卫艺术的出现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变化潮流并不能说明进步。把“进步”这一历史现象平面化直线化（线性不等于直线）为美学庸俗进化论。

在商品拜物教统治时代，时间本身商品化了，生命与时间都可以买卖而失去自身意义。艺术也成为一种人们被迫接受的图像—符号化消费，以一种与自然相分裂的“神性”力量淹没意义，摇摆在审美主义与去审美化两种极端倾向中。

“后现代之死”这一话题并不意味着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而是“后理论”状况中对新思维的期待。思想在传统到现代、后现代以及前路之间连续又不连续。“回到亚里士多德”意味着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语境下重新激活学科对象的本质论，最终把“善”纳入一种目的论相关的实践观与历史观中。“回到康德”就是通过后现代新启蒙使人达到新的理

性成熟，成为世界公民，通过世界联盟达到永久和平。通过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们》(1993)，杰姆逊的《理论的意识形态》(2008)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2001)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2009)……最后“回到马克思”。信息技术(I T)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剩余价值的增长幅度，以社会福利的方式实现再分配，通过股份制逐渐实现资产从私有转化为社会公有。资本主义走向自身否定是其追求最大化特性超越极限决定的。在该书“小跋”中我写道：要以“人类梦”、“世界梦”代替“天朝梦”、“皇帝梦”。

六、徘徊，零乱，向终途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音乐始终伴随着我的业余生活，不同于“美学不美”之形而上思考，这是实在的审美。90年代北京广播电台两次征文“音乐与我”，我均参与获奖。在《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文中写道：“我在美学理论研究的场面上立命安身，耕作不息，音乐是这片沃土上永远青葱的一片绿茵”；另篇则以培养儿子学小提琴的经历叙事。在初中我就怀着小提琴的梦想，每天省下一点上学早餐的钱积蓄买琴，直至工作后借单位工会的琴在简易教材下自学。

文革后期一些家庭以子女学一门艺术特长为躲避插队的途径。1973年，儿子七岁时我有心让他学琴。当时没有儿童小提琴出售，于是我请教一位乐团的小提琴制作师自己动手制作了从1/4到2/4尺寸两把儿童琴，虽然蹩脚，却也能成调，为他寻师觅教，于是指望在儿子身上实现自己的梦想……儿子出国后，我按照他走过的路子，一本本教程练下来，好赖也能拉一些经典曲目，足以自娱自乐。

2012年4月初我收到一个电话，中央音乐学院一位教师约我参加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官员与高级将领”组成的“三高爱乐乐团”。我欣然前往，第一次活动是在学院的排演厅，十多位琴友(其中一位当时已过80)在专家指导下排练《新春乐》，感觉很好。李岚清作为乐团发起者曾到现场讲话。两次活动后便确定月底到苏州演出，遗憾适逢我赴美一个月错过机会。归来恰逢乐团巡回演出后休整，夏天我去了山东，我努力地练习指定曲目，争取参加年底演出。至10月底返京，联络人告知：乐团已定员，定编，曲目也更换，以后有机会再通知我……他们年底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央视焦点访谈还作了专题报道，遂被上面叫停……

2008年我骑自行车不慎右手腕摔骨折，康复后虽还能拉琴，但柔韧、灵活性下降，越来越不堪入耳了。“30以后不学艺”，2014年，将近75岁，我从零开始练钢琴，这又是一个“半

路出家”，岂不“零乱”。按照教程每天4~5小时，5年下来大致能弹业余五一六级曲目，可以脱谱完整弹奏贝多芬的《致爱丽丝》、门德尔松的《威尼斯船歌》、图森的《野花》等，当然不能供别人欣赏。感觉比小提琴略入耳，李静也有同感，看来我更适于键盘乐，晚矣，晚矣！我一天两个多小时各种自我个保健活动，工作时间也只有两小时左右，十多年来大致每年最多发表两篇文章。

世界主义从世界公民身份认同到种种政治想象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历史建构的完成，于2018—2019，我以这一思路为《启蒙与美学》画上了句号，这也可能是40年来在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到走出后现代之“徘徊与零乱”心路历程之终途。该书或许是我的最后乐章。2018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承诺出版，该出版社是我的好朋友，40年来出版了我四本书。这些书的对马克思学说原创性的研究与现实的批判性也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合，能够面世确实不易，我对该社始终怀着感激之情。原想2019年本书适逢“五四”运动百年又是我光阴虚度80之际问世，想得很美。尽管交付出版社的稿子并无现有的一些禁忌内容，并且做了不少“脱敏”处理……那也不行。2020年初该社新任副总编突然告诉我终审没有通过，一方面说明眼下思想禁锢达到了新的强度，另一方面，出版社领导层也有人事变动。此前为我的两本书的出版担任过责任编辑，我的老朋友孙以年为本书投入了一年多的辛苦白费了。后来我的学生和同仁推荐了几家出版社，均无果而终。看来，在一个怕光的地方大讲“启蒙”确乎是自己找不痛快。正走投无路时，定居美国的老同学范琅给我传来美国华文记忆出版社的“出版简介”，此书有望得见天日了……

1928年6月3日，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忌日，清华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由陈寅恪撰，经常有学人来此瞻仰……2019年4月26日，“五四”百年前夕，该校突然于碑四周设两米高围墙，究此举缘由，原来碑文末段曰：

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如此以反五四启蒙精神对五四的“纪念”堪称“行为艺术”杰作。此类倒行逆施以不同形态见之于各地。这些学术官僚们不学无术，长于胁肩谄媚，丑闻、笑话连天，以挥舞大棒整人坑人为能事。因为民主自由之为普世价值撼动其特权，所以像怕火一样拒而避之。他们反人权，反普世价值唯一合法化的借口是“维稳”，殊不知其自身正是社会最大不稳定因素。“庆父不死”，国无宁日，民众何得安生，社会何以稳定？天下怎能太平？

小区一位朋友看了我近年在微信聊天群所发的东西，当面好心劝我：“别那样，你收入也不算低，衣食无忧，儿子出息在国外，晚年家庭幸福，何必如此忿忿不平……”

是啊，徘徊零乱，忿忿悻悻，“不知者谓我何求？”历经从反胡风、反右到文革，上一世纪30-40年代生之我辈，已是珍稀物种。托福命运之星，我与家人在这些运动中平安无事，只是无辜受难者的见证。至今来日无多，我无所需，亦无所求，但得能善终：只盼闭目永不见在政府门前下跪之民众；高层领导人出访不再遭遇“拦轿申冤”；不平者无须上访，上访者不再遭堵截殴打；教师在讲堂不再被举报受制裁……什么时候讲真话不再恐惧？何年何日公仆方能公开其“合法”财产？唯愿墨写的谎言不再遮蔽血写的事实……吾生得见此情此景，终而瞑目无憾。📷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部分 启蒙

引 论 1

一 后封建与后启蒙 7

（一）民主革命的对象与任务

——亚洲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与欧洲封建主义 8

（二）封建主义的本质属性是什么

——从土地所有制与权力结构来看 13

（三）封建与民主/集权与分权 17

（四）梦魇：封建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与文化 19

（五）资本主义时代的后封建问题 22

（六）后启蒙：新时代的反封建使命 24

二 生存论的建构规律是什么——人的权利与历史理性 28

（一）方法论的矛盾与历史观之暧昧 28

（二）宗法制所“赋”是人权吗？ 32

（三）“血缘理性”之非理性 34

（四）法定人权与历史理性 36

三 启蒙：一个永无休止的叙事——前启蒙到后启蒙 40

- (一) 火的故事与启蒙前史 42
- (二) 当前时代的启蒙——后启蒙 45
- (三) 启蒙，打开说真话的嘴 47
- (四) 后启蒙之本土寻根 51
- (五) 从后虚无到后启蒙——公共理性与历史理性 58
- (六) 从“启蒙辩证法”到“否定辩证法”
——一个提问“何为启蒙辩证法？” 62
- (七) 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 68
- (八) 瞬时美好之可持续性与新启蒙 74

四 世界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 从身份认同，政治想象到历史建构 81
- (一) 世界公民，从“省吾身”到“平天下” 81
- (二) 世界主义作为历史建构之终极指向 86
- (三)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91
- (四) 马克思的“人学”与“真正的共同体” 94
- (五) 共同体中的伦理、制度与法 97
- (六) 人的权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102
- (七) 人类命运最终决定于经济 105
- (八) 文化领导权与世界霸权 111

第二部分 美学

引论 118

- 一 庄子与启蒙——没有美学的美学 122
 - (一) 庄学之中的“美学散步”与“正步” 123
 - (二) “万物一齐”与“天籁之音” 127
 - (三) “天地大美”与“天下正色”——拒绝世俗形式 136
 - (四) “以恶骇天下”——没有美学，甚于美学 143
 - (五) “无为有国者所羁”
——庄子是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吗？ 147

- 二 美学公正与文学主体性 153
 - (一) 美学公正问题的思想资源 154
 - (二) 艺术与自然无高低之可比性 159
 - (三) “艺术高于生活”与文学主体性 161
 - (四) 艺术与现实之不可比性 165
 - (五) 艺术与理想 168
 - (六) 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资源 172
 - (七) 美学公正与新的人类主体性 176
- 三 “美育代宗教”与美学的“神性”
 - 评潘知常对蔡氏命题的颠覆 185
 - (一) 蔡氏命题的颠覆 186
 - (二) 宗教与美育 190
 - (三) 宗教与信仰 195
 - (四) 美学的神性 199
- 四 世界文学：异域之本土花 205
 - (一) 歌德的世界文学追求与审美心理 206
 - (二) 世界文学与世界市场及欧洲中心 208
 - (三) “不可翻译性”与美感共通性 210
 - (四) 世界文学与世界主义及普世价值 214
- 五 蔡仪的美学思想 217
 - (一) 从马克思主义进入理论空间
 - 《新艺术论》与《新美学》 218
 - (二) 与三重影子的搏斗 224
 - (三) 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 228
 - (四) 美学分歧根于哲学 231
 - (五) 自我超越之路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234
- 附 美学与文化访谈录 239
 - (一) 美学从定义中走出 239
 -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转向 246

- (三) 实践美学与主体性问题 248
- (四) 主体性与人类中心主义问题 249
- (五) 蔡仪与美学各派之争 253
- (六) 美学与批判理性/主流经济学与主流美学 258
- (七) 多元文化对话中的身份与宽容 261
- (八) 真理与价值以及美学上的本质主义 265
- (九) 文化转向与民族身份问题 272

第三部分 文化

引论 276

- 一 微时代的文化政治与美学之维——历史理性面临的新选择 280
 - (一) 什么是微时代 280
 - (二) 微时代的第一生产力 283
 - (三) 微时代与后启蒙 288
 - (四) 媒体决定论还是社会矛盾决定论 293
 - (五) 从“和平演变”到“颜色革命” 296
 - (六) 微时代之世界矛盾与变革前景 299
 - (七) “微”字当头之美学维度 302
 - (八) 微时代与大革命 305
- 二 从《罪与罚》到《天注定》——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碎片化 308
 - (一) 《罪与罚》作为复调叙事 309
 - (二) 文学叙事与音乐学的复调 312
 - (三) 从复调到拼贴，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碎片化 315
 - (四) 暴力论：拿破仑与大象 318
 - (五) 救赎与戕害 322
 - (六) 尾声 325
- 三 毛泽东的哲理与宿命 327
- 四 一种奇异的爱情——漫议爱国情怀 343
- 五 归者不识，识人未归——电影中的后文化创伤 353
- 六 范希衡与那个难忘的年代 367

- 七 徘徊与零乱——忿忿悻悻四十年 378
- (一) 人生大惑：大学 饥肠 欢歌 379
- (二) 从席勒到海德格尔——两部现代美学史 384
- (三) 半生中的后半 387
- (四) 走出后现代 389
- (五) 去学科化与返学科 394
- (六) 徘徊，零乱，向终途 397

【北大史料】



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 (1-3 卷)

Selected Archival Documents on Peking Universit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胡宗式 章铎 编

编者按

毛泽东自誉自己一生干的第二件大事，即发动和领导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这场史无前例惊天动地的运动，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影响深刻而久远。

毛泽东全程直接或间接操控北大文革运动，北京大学是文革的策源地，也成为文革的重灾区。弄清北京大学文革发生、发展到消亡的历史，了解北大文革中所发生的事情，会有利于对中国整个文革的认识和理解。

由王学珍、王效挺等人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是北大官方的出版物，其关于文革部分的记载，不少内容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我们指出《北京大学纪事》中的一些问题，只是为了对北大的这段历史负责。我们当年都是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的成员，亲历了北大文革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希望在有生之年，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为当今的文革研究者及后人提供一点线索和方便，而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事实搞清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总结文革给我们民族带来的惨烈教训，才能以史为鉴。

从本世纪初，我们开始收集关于北大的文革资料。在收集文革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众多校友的无私帮助。例如：陆水林拿出他保存多年的北大《动态报》；刘淑君将她保存的有关聂元梓、孙蓬一的资料送给我们；谢定国、陈景贵提供了自己的“文革日记”；孙月才（新北大公社负责人）寄来了他保存的“绝密”简报；李清崑（原校文革办公室主任）、高云鹏（第一张大字报作者之一）、谢甲林（保卫组负责人）等老师亲自撰文并提供一些资料；“除隐患”战斗队队长赵建文以及王茂湘（校文革常委）等人，生前都向我们讲述了许多珍贵的事实；校刊编辑曹林棣保存了全套《新北大》供随时调用。

我们自己保存的文革资料，在清查“五一六”时大部分被洗劫了，只留下当年“新北大公社火车头”编印的《毛主席的新北大》和少数信件。粉碎四人帮后，孙蓬一的来信和其家属的申诉也保留了下来。为了将手头的这些资料能被保存并流传下来，章铎在退休后开始学习打字，至今已经完成了数百万字的文字输入。

此外，我们还通过如下途径，获取相关资料：

1. 网络查询：例如，我们曾在北京市委网站“宣讲家”历史文献栏目中查到当年的一些资料。

2. 在旧书网上寻找有用的资料并下单购买，很多珍贵的资料，都是由此种方式获得的。如郭罗基的大字报《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吴子勇的四月形势图》、《吴传启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等。当我们从网上购买到寻觅许久的重要资料时，那种兴奋之情是

难以言表的。为了获取《北京日报》1967年6月7日社论，我们还不惜高价买回整月的报纸。

3. 在《文衡文化发展中心》用相机拍摄了关于北大文革的有关资料。

受篇幅的限制，我们所选编的资料，只是现有材料的一部分。选编的原则，侧重于那段文革历史时期所发生的有影响的事件。例如：1966年关于聂元梓执行什么路线的大辩论；1967年的反击二月逆流、炮打谢富治、与王关戚在基层的势力吴传启等人的斗争；1968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黑风”等。

本套丛书为读者提供了近一百万字的文革资料，基本上是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进行编排。这些原始资料，是我们还原北大文革真相的基础。

本书收录的文革资料，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这些资料随意性很强，没有统一的标准。有的资料没有日期；有的资料没有署名，即便有署名的，情况也是五花八门；在文字的使用上，更是乱象丛生。为保持文献资料的原貌，我们只对个别明显的错误进行了修正。

需要说明的是：所收集的这些资料，虽然对研究那段北大文革的历史真相，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我们并不认为所列资料中的事例都是事实。在那个特殊年代，无论哪派，虚假的宣传都是很多的。我们把它们列在这里，一是这些资料有的是孤本了，弃之可惜；二是给研究者提供一个线索，请研究者在使用这些资料时反复对比和考证。

我们虽然是北大文革的亲历者，但作为个人，能力和认知都有限。我们所提供的文革资料，只是冰山一角，期盼知情者给以补充与修正。📧

第一卷 内容简介

本册收录了1966年6月至1967年9月北大文革中有影响的简报、大字报、讲话、重要文章等。内容包括1966年关于北大校文革执行什么路线的大辩论和1967年校内外不同意见的对撞。新北大公社“独立寒秋战斗队”所撰写的《首都高校两派矛盾的由来、发展和关锋、王力有关讲话》一文，全面揭示了1967年发生在北大和北京高校的各种矛盾和斗争。

目录

-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 1
- 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 3
- 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 6
-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公告 7
- 聂元梓1966年8月5日的广播讲话 8

- 聂元梓想存，想亡？！！ 12
- “造三个大反” 13
-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公报 17
- 搬开聂元梓 北大才能乱 17
- 北大文化革命又处在关键时刻 18
- 要彻底革命，不要改良派 21
- 拨开迷雾万千重，试看庐山真面目 25
- 两条路线与两种世界观 32
- 聂元梓在纪念“六·一”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8
- 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40
- 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 41
- 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从炮轰中央文革谈起 43
- 东风兵团编写的大事记 47
- 北京公社编写的大事记 57
- 红联军总部发言人 1966.12.1 的讲话 64
- 哲学系“风雷激”战斗队的造反声明 74
- 赵丰田退出红联军的声明 76
- 樊立勤 1967年1月6日在大饭厅辩论会上的发言 76
- 校文革改组通告 86
- 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 87
- 郭罗基大字报贴出后《动态报》等的有关报道 89
- 周培源在 1967年3月27日干部亮相大会上的发言 91
- 孙蓬一的“4.12讲话” 99
- 一个蓄谋已久的反革命事件 103
- 北京地质学院的“4.16声明” 111
- 徐运朴、侯汉清的大字报 112
- 孙蓬一必须悬崖勒马，低头认罪 114
- 郭罗基的“4.30讲话” 116
- 新北大东方红公社成立宣言 119

- 揭发吴传启的材料 122
- 红旗 体育战线 井冈山 东方红联合版 1967.6.3 社论 130
- 关于揪斗潘梓年的声明 132
- 《北京日报》1967.6.7 社论 133
- “6.6”串联会 1967.6.9 声明 136
- “6.6”串联会 “03 起风雷” 的文章 137
- “6.6”串联会 1967.6.13 声明 141
- 我究竟是不是叛徒? 143
- 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143
- 触目惊心的四月形势图 164
- 孙蓬一与四月形势图 165
- “红暴队”的揭发材料 169
- 从动态组看孙蓬一的罪行（第一批材料） 169
- 从动态组看孙蓬一的罪行（第二批材料） 172
- 从动态组看孙蓬一的罪行（第三批材料） 174
- 广播台揭发孙蓬一攻击《北京日报》 177
- 周培源 1967年6月16日讲话 177
- 孙蓬一 1967年6月29日的检查 179
- 靳枫毅的揭发材料 184
- 周培源等人的公开信 185
- 揭 聂 孙 188
- 彻底砸烂北大的特务机构——黑“二组” 191
- 保卫组张贴的传单 195
- 周培源 1967年7月29日的讲话（摘要） 201
- 牛辉林 1967.8.9 在北大38楼前的讲话（记录稿） 203
- 井冈山兵团成立宣言 206
- 井冈山兵团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208
- 聂元梓 1967.8.21 讲话记录 210
- 从聂元梓的所作所为看她对陈伯达同志指示的态度 211

- 三十五个为什么？ 217
- 就“地下常委”问题走访郭罗基同志 219
- 白晨曦同志谈地下常委 222
- 《新北大报》1967.8.30社论 224
- 谁是最大的黑手——三十个为什么 224
- 首都高校两派矛盾的由来、发展和关锋、王力有关讲话 226
- 王乃英关于北京市文革初期活动的交待 241

第二卷 内容简介

王关戚倒台后，北大和北京高校两派的矛盾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激化。本册收录了一些重要传单、声明和文章，还收录了四人帮倒台后孙蓬一给胡宗式夫妇的来信等。《扬子浪日记》和《牛山丑史》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年北大两派斗争的现状。除隐患战斗队的文章《斩断林杰反革命集团伸进新北大的黑手》值得一读。

目录

- 斩断林杰反革命集团伸进新北大的黑手 1
- 扬子浪日记（1966.8.5~1968.2.2） 42
- 谭厚兰的检查 89
- 聂氏家族的复灭和聂元梓的前途 95
- “东方红”的战车要把“团”“O”百姓拉向何方？ 105
- “1.15小报”的相关内容 110
- 社论：为誓死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而战 110
- 崔雄昆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乏走狗 111
- 北京揪出了一个新的社会阴谋集团 116
- 不许为关王林反党集团招魂 119
- 为“二月逆流”翻案的自供状 124
- 把聂三六拿来示众 130
- 揪出变色龙 扫除小爬虫 133
- 向右倾翻案黑风放火开炮！坚决将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 133
- 痛击右倾翻案黑风，揪出“二月逆流”派的黑后台 135

- 张本被捕说明了什么？ 137
- “逆派（聂派）”春季言论集（部分）（加按） 138
- 井冈山兵团关于目前形势的声明 140
- 地质《东方红》公社对目前形势的声明 143
- 地质《东方红》公社关于目前形势的再次声明 144
- 聂孙之流就是不折不扣的“二月逆流派” 145
- 地质《东方红公社》总部严正声明 149
- 孙蓬一的检查及工军宣队的批语 150
- 宣传队领导谈推举聂元梓当九大代表 159
- 孙蓬一等人的“1.27 大字报” 160
- 孙蓬一给胡宗式的来信 162
- 孙蓬一 1976年11月11日来信 162
- 孙蓬一 1976年11月18日来信 163
- 孙蓬一 1976年11月26日来信 165
- 孙蓬一 1976年12月11日来信 166
- 孙蓬一 1977年1月3日的来信 169
- 孙蓬一 1977年1月12日来信 172
- 孙蓬一家属的申诉 174
- 柴树园给上级领导的信 174
- 对孙蓬一问题的询问和申诉 175
- 牛山丑史 177
- 聂元梓向全国人民检讨文革 234

第三卷 内容简介

（一）《毛主席的新北大》——这是新北大公社火车头编辑部 1967年11月出版的油印刊物，内容是1966年6月至1967年10月中央领导和其他负责人关于北大的讲话。为保持历史原貌，基本采取原排版的方式，除个别明显的错别字外，对原文不加更动。

（二）韩爱晶《毛泽东“7.28 召见”的谈话记》。

（三）相关领导人的其他讲话。

目录

- (一)《毛主席的新北大》 5
- 最高指示 6
-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6
- 前言 6
- 毛主席关怀新北大 7
- 康生同志对北大同学的讲话 1966.6.5 上午10时 9
- 江青、陈伯达同志在北京大学视察大字报时的讲话 1966.7.22 10
- 陈伯达、江青同志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1966.7.23 10
-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1966.7.23 晚8:00 11
- 在全校辩论大会上 江青、康生同志的讲话 1966.7.25 11
- 康生同志在北大全校辩论大会上的讲话 1966.7.25 12
- 陈伯达、康生同志在北京大学东操场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1966.7.26 12
- 康生同志接见十几所高等院校部分同学的谈话(摘录) 1966.7.28 15
- 康生、江青同志在北大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1966.8.4 15
- 陈伯达同志在北大的讲话(摘要) 1966.8.24 凌晨 20
- 康生同志接见部分来京革命串连同志时的讲话(摘) 1966.9.8 21
- 周总理对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讲话(摘) 1966.9.26 21
- 周总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 1966.10.28 21
- 江青同志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摘录) 1966.11.28 21
- 康生等同志在与三司、北航红旗等单位座谈会上的插话 1966.12.14 22
- 康生同志批驳北大技物系崔子明等的两封反动信件 1967.1.3 23
- 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北京大学代表谈话纪要 1967.1.3 晚 24
- 陈伯达、江青同志做重要指示 1967.1.16 26
- 周总理谈革命造反派夺权 1967.1.18 26
- 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在元月廿二、廿三日的重要讲话 27
- 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中央首长
- 与首都大中专院校革命造反派学生代表座谈记录 1967.1.26 28
- 在中国人民大学辩论大会上戚本禹同志的讲话 1967.1.30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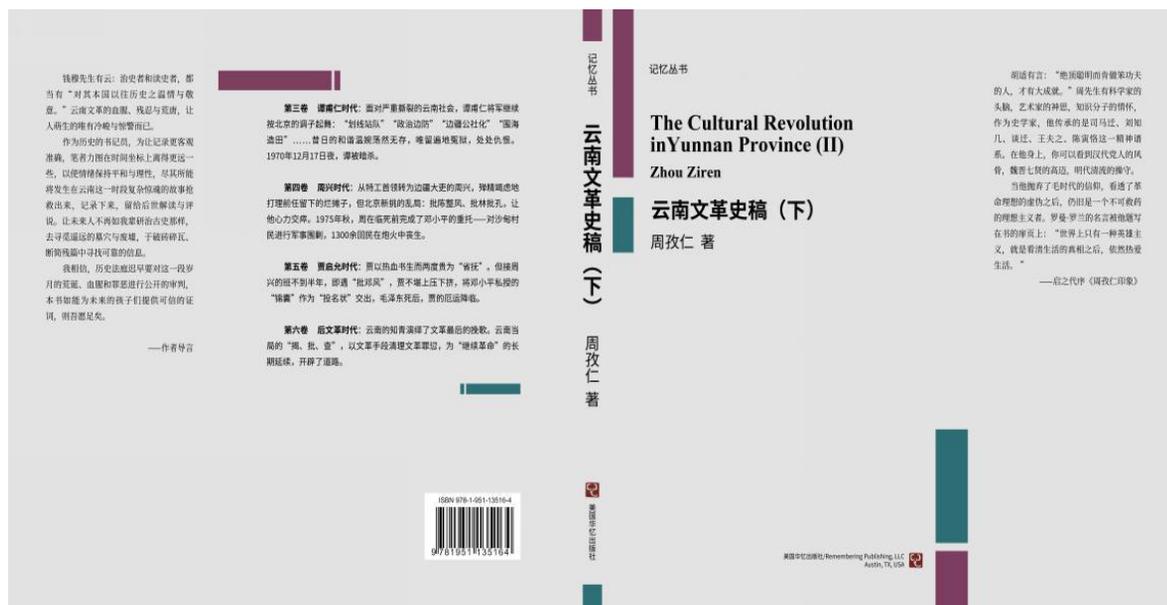
- 戚本禹给聂元梓、蒯大富的电话 1967. 2. 13 33
- 戚本禹同志接见红代会筹备人员时讲话（摘） 1967. 2. 13 33
- 周总理接见内蒙军区、区党委负责人及内蒙三司、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代表会上讲话（摘） 1967. 2. 16 34
- 周总理接见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摘） 1967. 2. 17 34
- 戚本禹同志与红代会代表座谈纪要（摘） 1967. 2. 19 34
- 中央首长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67. 2. 22 34
- 谢富治副总理、戚本禹同志
接见红代会核心成员及部分工作人员 1967. 3. 4 36
- 谢副总理、戚本禹同志接见红代会
所属单位小报负责人、各印刷厂代表时的讲话（摘录） 1967. 3. 4 36
- 戚本禹同志接见地院东方红部分同学讲话（摘要） 1967. 3. 5 37
- 陈伯达、戚本禹同志与北京大学革命师生代表座谈纪要 1967. 3. 27 37
- 紧跟毛主席，做人民的好儿子 ——戚本禹同志三月二十九日讲话 40
- 邓颖超同志对红卫兵革命造反派展览会筹委的电话指示 1967. 4. 8 41
- 中央文革紧急通知 1967. 4. 12 41
- 陈伯达、江青等接见红代会各院校代表的讲话 1967. 4. 14 42
- 周总理接见广州市各革命组织代表的座谈纪要（摘录） 1967. 4. 15 47
- 江青接见中学代表讲话（摘录） 1967. 4. 16 48
- 周总理在广州接见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及驻军代表的讲话 1967. 4. 18 49
- 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1967. 4. 20 49
- 谢副总理给大专院校红代会的电话指示 1967. 4. 26 50
- 周总理、康老接见国际关系学院代表讲话摘要 1967. 4. 28 50
- 康老接见中央组织部全体革命同志的讲话（摘） 1967. 5. 6 50
- 谢副总理与红代会各校负责人座谈摘要 1967. 5. 7 51
- 谢富治副总理在北大的讲话（摘录） 1967. 5. 7 52
- 陈伯达等同志接见外事口系统革命造反派的讲话 1967. 6. 3 53
- 陈伯达、谢富治在红代会核心组会上的讲话（“6. 5 讲话”） 58
- 伯达秘书王保春同志传达伯达秘书王文耀同志的电话指示 62

- 陈伯达同志六月九日指示 62
- 谢富治副总理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的一段讲话 1967.6.9 62
- 陈伯达同志与北航部分同学座谈纪要 1967.6.11 63
- 谢副总理接见北航红旗韩爱晶、井冈山等的讲话(摘) 1967.6.12 64
- 在接见新北大各组织代表的会上谢富治、丁国钰同志讲话 1967.6.16 64
- 陈伯达、谢富治等同志接见北航红旗等院校的谈话纪要 1967.6.20 71
- 谢富治副总理接见北大校文革、新北大公社负责人
和解放军驻新北大代表时的讲话 1967.6.20 73
- 史敬堂同志传达伯达同志指示 1967.7.3 77
- 陈伯达同志谈教育革命 1967.7.4 77
- 伯达等同志在接见大中学红校代会
和驻校解放军代表时的讲话(摘录) 1967.7.6 78
- 中央文革接待站接待员×××同志谈北大 1967.7.8 78
- 伯达同志指示 1967.7.9 78
- 陈伯达在北大的讲话 1967.7.10 凌晨 79
- 伯达同志给聂元梓同志电话指示 1967.7.10 83
- 陈伯达同志与聂元梓的谈话 1967.7.10 83
- 陈伯达同志接见新北大校文革、新北大公社代表时的讲话 1967.7.10 85
- 中央文革召开山西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摘) 1967.7.13 86
- 戚本禹等同志在中宣部的讲话(摘) 1967.7.16 凌晨 86
- 陈伯达、谢富治同志在接见武汉革命造反派会议前
与首都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 1967.7.28 87
-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同志
在同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等单位的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1967.8.10 88
-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同志
在同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等单位的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1967.8.11 92
- 中央首长接见红代会核心组会议上的讲话 1967.8.16 凌晨 96
- 中央首长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重要讲话(摘要) 1967.9.1
- 中央首长接见“天派”代表的讲话 1967.9.16 103

- 中央首长接见“地派”代表的讲话 1967. 9. 17 114
- 聂元梓同志传达九月二十二日吴德同志讲话 120
- 谢副总理关于恢复校文革保卫组工作的批示 1967. 10. 1 121
- 王文耀同志传达伯达同志指示 1967. 10. 2 121
- 谢副总理在市革委会常委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7. 10. 5 121
- 陈伯达、戚本禹对《人民日报》社工作人员讲话摘要 1967. 10. 7 121
- 吴德、黄作珍接见北京日报两派代表的讲话 1967. 10. 8 上午 122
- 谢副总理关于新北大校文革问题的指示 1967. 10. 14 124
- 谢副总理的讲话（摘录） 1967. 10. 23 125
- 谢副总理接见红代会学习班成员的讲话（摘录） 1967. 10. 24 125
- 谢副总理在市革委会上的讲话 1967. 10. 26 125
- 附录1 ××在北大传达李雪峰讲话 1966. 6. 3 126
- 附录2 在北京大学全体革命师生员工庆祝党的生日的大会上陶铸的讲话 1966. 7. 1 132
- 附录3 曹狄秋的讲话 1966. 7. 25 135
- 附录4 王任重的大字报 1966. 7. 27 136
- 附录5 刘少奇对张承先“6. 18”反革命黑报告的黑批示 136
- 附录6 陶铸八月廿七日就当前革命串连问题给我校聂元梓同志和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的一封信 136
- 附录7 刘少奇的检查 1966. 10. 23 137
- 附录8 邓小平的检查 1966. 10. 23 137
- 附录9 李雪峰在北大的检查 1966. 10. 29 138
- 附录10 林杰、周英、吴传启借口中宣部夺权事件打击、迫害无产阶级革命派，关锋、王力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讲话 142
- 附录11 林杰同志接见北师大“井冈山”的讲话 1967. 2. 2 143
- 附录12 王力、关锋的电话批评 1967. 2. 4 143
- 附录13 王力对《红旗》杂志通讯员的讲话（摘） 1967. 2. 14 144
- 附录14 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中宣部工作人员时讲话 1967. 6. 1 144
- 附录15 1967年5月27日关锋的批评 147

- 附录 16 清华井冈山访林杰同志谈话纪要（北京公社转抄） 148
- 附录 17 关锋的批评 1967.8.2 150
- 附录 18 关锋、×××接见农民战争史编写组成员的谈话记录 150
- （二）毛泽东“7.28 召见”谈话记 韩爱晶 153
- （三）其他领导人的相关讲话 172
- 江青在北大东操场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1966.7.26 172
-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1966.10.23 174
- 戚本禹、余秋里接见北师大井冈山时的讲话 1966.10.29 177
- 戚本禹关于红卫兵在孔庙造反给山东省委的电话记录 181
- 陶铸对教育部文化大革命的五点意见 1966.12.17 181
- 戚本禹给教育部徐昕等同志的信 1966.12.20 182
- 李先念接见建工部革命造反总部代表时的讲话 1967.2.5 183
- 戚本禹对批判陶铸联络站的指示 1967.2.9 184
- 谢富治戚本禹与北京三个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座谈纪要 1967.2.21 185
- 戚本禹、关锋在《光明日报》社职工大会上的讲话 1967.3 185
- 陈伯达、戚本禹与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纪要 1967.5.4 190
- 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宣部的谈话 1967.7.16 195
- 戚本禹在“揪刘火线”上的讲话 1967.7.26 201
- 李钟奇接见北大井冈山代表的指示 1968.1.2 207
- 郑维山、吴德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 1968.3.21 208
- 林彪等中央领导重要讲话 1968.3.24 209
- 谢富治在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968.3.25 227
- 谢富治、吴德、丁国钰在北大的讲话 1968.3.25 230
- 谢富治、温玉成等在北京大学制止武斗的讲话 1968.3.29 231
-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上的讲话 1968.5.4 233
- 陈伯达在北大谈话摘要 1970.4.3 236

【历史研究】



云南文革史（下卷）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Yunnan Province

周孜仁 著

内容简介

第三卷 谭甫仁时代 面对严重撕裂的云南社会，空降来滇的谭甫仁将军继续按北京调子起舞：“划线站队”、“政治边防”、边疆公社化、围海造田……共产党执政边地播撒过的和谐与温婉荡然无存，但留遍地冤狱，处处仇恨。将军本人亦在震惊全国的“017案件”中被暗杀，留下惊悚大片诡异的情节和街巷的凶异谈资，还有等待收拾的一地鸡毛。

第四卷 周兴时代 周曾被斯诺《西行漫记》誉为中共“特务头子”。残酷的党内斗争让他既心生恐惧又难以自弃。他殚精竭虑打理前任留下的烂摊子，但北京新挑的乱局：批陈整风、批林批孔……让他左支右绌，心力交瘁。1975年秋，周死期将临，滇南沙甸的回民武装对抗让他不得不主持军事进剿。炮火夷平的村庄和近1300村民和军人的尸骨成为周兴葬礼的献祭。

第五卷 贾启允时代 第六卷 后文革时代 跋：亲历者的使命 贾启允以热血书生而成中共宦吏，两度贵为“省抚”。正是神州多事时，他遂成了典型“倒霉蛋”：第一次当贵州省委书记，仅过一年即成该省最大“走资派”被打倒；第二回被邓小平点名接周兴的班，不足半年，又遇全国“批邓风”，贾不堪上压（北京）下挤（造反派），竟将邓私授的“锦囊”作为“投名状”交出，为全国“批邓”提供了一大钢鞭。好不容易撑到毛泽东仙逝，贾的厄运终于降临。

第六卷 后文革时代 跋：亲历者的使命 文革破产提供了全民和解和转型正义的绝佳时机，而本卷披露云南“揭、批、查”用文革手段清理文革罪愆的大量案例，预示历史注定还要以继续革命的方式长期延续。本书最后记述了知青故事：四川、重庆知青的受难、上海知青的绝食卧轨，还有云南知青异国从军悲剧——与中共输出的革命破产同步，异域亡命者独特的遭遇，演绎了文革最后的挽歌。📖

跋：亲历者的使命

敲完最后一行字。我确信我完成了一件有价值的工作。心内轻松却并不踏实。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书写这段时代，我觉得自己的笔太笨拙，又太沉重。莽莽撞撞踏进历史研究这片神圣之域，仅仅因为是被这段荒诞岁月裹挟而入的亲历者，冥冥中命运使然，责任使然，于是硬着头皮动起手来。几年来夙兴夜寐地写，寝食不安地写，不经意间，终得留下了面前这个文本。

我本是工科大学毕业生，好像成绩还不错，应该成为一个优秀工程师的，所惜命运捉弄，文革爆发，偏偏让我去陌生的政治斗兽场经历九死一生。遭受人生初次打击之后发配云南边疆，莫名其妙又到当地最高权力机构当了一回秘书。这该是让人羡慕的职位，我却不感半点荣耀，恰恰相反，丑陋的政治争斗和晦明莫辩的国家图景，让我一直心怀惴惴。我为自己的生命将消磨于如斯乱世而困惑，所幸突围逃离之中似有顿悟，确信做一个时代的书记员，我是办得到的。不需要更多条件，有一支笔和一颗真诚的心，就够了。自此，这成了我一生的宿命。

岁月倏忽，已然垂暮之年的我终得兑现了承诺：为历史留下了不少回忆文

字——用自己喜欢的话说，为时代的履历表填写过一行注脚。未受过专业历史学训练，要直接、全相、毫不避讳地书写历史，即直接填写庞杂繁复的时代履历表，而不是作注，实为一全新的挑战。

幸好，我有那么多同样经历过那段劫难的朋友，他们非常热心地为我提供了辗转存留下来的丰富资料：记录成文的和躲藏在脑子里的。一位经历了“下关116大武斗（滇挺事件）”的朋友，得知我的计划后专约了访谈，他凄然而欣慰对我说，如果没遇见我，他就只能把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带进坟墓的。我省委办公厅做秘书时，胡延观曾是我的领导，他年轻有为而才华横溢，皆因爱揽事，成了官场争斗的牺牲品，85岁的他除给我介绍了许多官场旧事，还把近十万字的狱中“交代”给了我。同样，早已年过八旬的沈炳章曾以知识分子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共“九大”，他把文革后囹圄之灾和流亡期间的全部回忆录交我作为参考。朱克家是全国知青达人，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直接参与云南省委常委工作的，他毫无保留地给我提供了上层活动的情况；还有不少朋友或借或赠给我动乱岁月幸存的小报和传单：他们都是当初响当当、今天穷得叮当响的风云人物：汪首学、汤克文、刘光华、许少先、沈参雄、杨寿……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还有一些体制内担任职务大小不等的朋友（恕我姑隐其名）。没有他们的帮助，这部书是不可能完成的。在此一并表示我真诚的谢意。

许多知名文革研究专家的鼓励，是本书得以完成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启之老师自始至终是本书的推动者；何蜀先生从文革史家的角度，热心地为我提供了所需的所有帮助；石名岗先生甚至对草稿的若干细节都作了仔细订正；陈永迪是在军队大院长大的文革研究者，更从他最熟悉的领域为本书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资料；高级工程师张振钧先生曾是滇南地区最早的造反领袖，除了自撰的回忆文稿，还专程回旧地为本书搜集了许多重要资料；四川从事文革小报研究的王锐先生，把他花数十万巨资购得的、关于云南的旧藏全部复印给我……我不是一个人在工作。很多朋友都站在我的身后，让我倍觉幸运和给力。

我还常常想起司马迁、想起斯宾诺莎和顾准，他们“掰下肋骨做火把，燃烧自己，照亮道路”的精神让我不敢丝毫懈怠。我生怕中国亿万人用血泪、苦难甚至死亡铸就的集体记忆被遗忘；亦生怕上帝在某一天会忽然将我宠召而去，

来日不多，我担心我的使命功亏一篑：以亲历者和见证人的身份为历史法庭的最终审判，留下一段可信的证词。为此，我必须努力。

本书的写作，于我也是一个学习过程。除了懂得写史必得有翔实的史考、准确的因果判别这些基本要件，教科书式书写的基本知识乃一无所知。我只能一边读书学习，一边抢救和打捞这些破碎的痛史，并仔细拼接，并恢复它们的温度，让其变得真实而鲜活，让生活、挣扎、抗争其中、遍体伤痕的人们站出来讲述，按中国传统史学的主流写法，从政治大事件的角度构建云南文革的历史全相，为读者讲述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我不否认，在记录史实的过程中，有关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知识也一股脑儿扑面而来。我不愿回避我的人文关怀、理性认知和价值判断。德国客观史学鼻祖蓝克提出“历史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为了达到“完全的客观”，必须“消灭自我”[1]。我坦承我办不到。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主张：“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更何况，我的这些认知和判断，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亲历者灵魂熬煎和拷问的思想伤痍，我希望它们和所记录的史实一样，作为历史的证词，一起留给未来的孩子们。

法国大革命过去 200 多年，研究著述汗牛充栋，至今仍频现迭出；纳粹第三帝国过去 70 多年，苏联消亡 20 多年，研究成果累累。文革破产刚过 40 余年，在文革的故乡就已成为公开的禁区；随着亲历者渐渐老去的次第归天，许多真相将埋入岁月的泥土而消融无痕。对于几千年来最为重视书面历史的中国，抢救文革史料，记述浩劫原貌，已成为刻不容缓的时代主题。俄国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我已别无长物，仅有刻骨铭心的记忆而已。如果不再做这项工作，我真配不上所受的苦难了。咬咬牙，记下来，留给未来的孩子们吧！但愿这个匆促抛出的砖瓦，能够引来宝石美玉。❏

2019年10月3日

于昆明蜗居

[1] 见蓝克《世界史》一书序言

目录

卷三 谭甫仁时代：热昏岁月

卷首导读

第一章 加热仇恨

1.1. 省革委前六次全会的基本情况

1.2. 军方的态度

1.3. 北京的恶例

第二章 七次全会的会里会外

2.1. 高压与内讧

2.2. “划线站队”：云南社会的全员惨祸

第三章 边疆“新秩序”

3.1. “政治边防”

3.2. 歇斯底里的表“忠”闹剧

3.3. 围海造田和通海地震

第四章 暗流

4.1. 九次全会

4.2. 庐山闹剧的云南声部

第五章 “017凶杀案”

5.1. 凶案现场回放

5.2. 案破前后

卷四 周兴时代：破船负重泛中流

第一章 从“批陈”到“913”

1.1. 谭甫仁的政治遗产和周兴面临的挑战

1.2. 烂摊子 开门红

1.3. 一路纠偏

1.4. “913事件”的云南折光

第二章 “批林整风”在云南

2.1. 尴尬的“洗地”

2.2. 以政治批判开路的计划工作会

2.3. 边疆民族问题

2.4. 林彪的“钉子”与周兴的两难

2.5. 新干部

第三章 “批林批孔”：“66乱局”蹙脚的微缩版

3.1. “批林批孔”前的云南政局

3.2. 戾风初起

3.3. 大戏开锣

3.4. 混战与闹剧

3.5. 进退维谷的周兴

3.6. 短命的喧嚣

第四章 云南民族关系的血色之殇（上）

4.1. “回乱”溯源

4.2. 政治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二重复调

第五章 “100天会议”和26号文件

5.1. “100天会议”前奏

5.2. 精选版“北京学习班”

5.3. 关于26号文件

5.4. 扫清道路

5.5. 老干部的节日和八派的梦魇

5.6. 政治经济学

第六章 云南民族关系的血色之殇（下）

6.1. 沙甸问题“政治解决已无可能”

6.2. 沙甸的军事进剿

卷五 贾启允时代：难以维持的“维持会”

第一章 匆促的序章

1.1. 临危受命

1.2. 短暂的快感

1.3. 毛泽东绝地反击

第二章 乱局 3.0 版

2.1. 周恩来之殇和吊诡的“五一八事件”

2.2. 变动不居的云南政治版图

2.3. 地委书记会议与政治骚乱

2.4. 北京的高压和贾启允的“投名状”

2.5. 关于理论和理论讨论会

2.6. “40 天会议”

第三章 绝响

3.1. 訇然日落

3.2. 遥远的回声

卷六 后文革时代：无法告别的“继续革命”

第一章 权力依旧傲慢

1.1. 错失的和解良机

1.2. 贾启允机会主义的终结

1.3. 安平生、陈丕显治滇

1.4. 官僚体系的重建

第二章 造反派的末日

2.1. 定点清除

2.2. 作为“行为艺术”的“两案”审理

2.3. 诸神陨落

第三章 最后的挽歌

3.1. 文革伴生物

3.2. 狂欢与苦役

3.3. 真相浮出水面

3.4. 自我救赎

3.5. 异域梦断

跋：亲历者的使命/参考文献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